



## 大会

第四十九届会议

正式记录

## 第七次逐字记录

1994年9月27日,星期二,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埃西先生	(科特迪瓦)
嗣后:	塞尼洛利先生(副主席)	(斐济)
嗣后:	西索瓦·西里拉亲王(副主席)	(柬埔寨)
嗣后:	洛佩斯·达罗萨先生(副主席)	(几内亚比绍)
嗣后:	埃西先生(主席)	(科特迪瓦)

下午3时30分开会

## 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冈蒂斯·乌尔马尼斯先生讲话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首先听取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冈蒂斯·乌尔马尼斯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冈蒂斯·乌尔马尼斯先生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向大会讲话。

乌尔马尼斯先生(以拉脱维亚语发言,由代表团提供英文稿):主席先生,请允许我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并祝你在领导本庄严机构时取得成功。祝本届会议对你和各国代表团都是建设性的、有益的。

在二十世纪末出现了新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技术现实。破坏性的冷战已经结束,它的象征——柏林墙——已经倒塌。许多民族长期以来对自由和独立不可压制的渴望终于导致了甚至貌似坚不摧的苏联帝国的解体,从而再次明确确认了《联合国宪章》所包含的原则——和平、平等和正义——的持久力量和完整性。因此,联合国一直并将继续在推动各国的进步中发挥作用,这体现在它在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方面采取的伟大行动,及其为改善社会和每个个人的福祉所作的努力中。

两年前,秘书长在他的报告《和平纲领》中全面分析了与维持和平与安全有关的问题。该报告导致就预防性外交、维持和平、建立和平以及在冲突后缔造和平之类的概念开展了一场广泛的辩论。联合国和其他组织的预防性外交无疑推动了对拉脱维亚和整个欧洲的一个非常棘手问题的解决。这一问题就是,外国军队撤出波罗的海国家的领土。

我要满意地向大会报告,题为“外国军队完全撤出波罗的海国家领土”的大会1992年11月25日第47/21号和1993年11月15日第48/18号协商一致决议总的说已得到执行。最后一批俄国军队已在8月底离开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因此,对波罗的海国家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我们与俄罗斯联邦所进行的长达两年多的双边谈判最后导致于1994年4月30日签署了协定。协定的批准已列入拉脱维亚议会的议程。

我可以完全有信心地说,国际上发出的要求俄国军队撤出的呼吁,其中包括联合国以及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发出的呼吁,对成功解决这个得不到解决的问题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认为,这一办法作为解决其他全球问题的样板可以对我们有所助益,我们准备与其他国家交流我们的经验。

联合国和欧安会将继续在各项协议的执行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根据拉脱维亚和俄罗斯就斯科伦达雷达设施达成的双边协议,任何想通过军事威胁或使用武力解决与协议有关的争端或分歧的企图将被视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将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欧安会的代表将观察协议的执行情况和各方履行义务的情况。

然而,我们在波罗的海地区尚未充分利用预防性外交的一切机会。波罗的海的区域安全继续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在今年夏季访问拉脱维亚的时候,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威廉·克林顿先生强调,主权和独立的波罗的海各国不能成为任何势力范围的一部分。应该指出,克林顿总统在解决我们与俄罗斯联邦就该国从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撤军进行的谈判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还要提醒国际社会,俄国的雷达设施将留在斯科伦达五年半,它的核反应堆将留在爱沙尼亚的帕尔吉斯基。俄国的大量军事运输都经由立陶宛到达加里宁格勒。在那里保持高度军事集结。总的来说,这些是给波罗的海各国,实际上整个波罗的海地区构成潜在威胁的危险因素。在许多方面,波罗的海的安全是欧洲的和平与稳定的保证。波罗的海国家已经在考虑对这个重要问题采取可能的解决办法。我希望各会员国将充分注意和关注这些方面。

随着俄国军队完全撤出拉脱维亚,我们两国之间的一个重要对话便告结束。由于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拉脱维亚今天没有外国军事存在。然而,如果没有双方表现出的远见和礼貌,那么今天我们便不可能站在这里谈拉脱维亚的社会和领土容忍,我们也不可能说拉脱维亚和俄罗斯联邦减少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今年春季,我在莫斯科与叶利钦总统会晤后,深信在解决我们的问题时,他是具有善意的。

在1995年,欧洲和全世界将庆祝同盟国战胜纳粹五十周年。拉脱维亚人也曾进行反对希特勒占领军的战斗,他们相信,在同盟国取得胜利后拉脱维亚将重新获得独立。然而,尽管许多国家在纳粹占领结束后再次获得自由,但波罗的海国家却第二次被苏联极权主义帝国吞没。在其他国家庆祝击败纳粹主义时,在拉脱维亚,数十万无辜者被驱逐,拉脱维亚的国家和民族特性遭到了有计划、有步骤的破坏。拉脱维

亚和拉脱维亚人民是两个政权——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受害者。

如果在推翻“邪恶的帝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新的民主的俄国能够与拉脱维亚一道对苏联在1940年对拉脱维亚所采取的行动进行评判,那么正义将取得胜利。签署符合事实的双边文件将排除任何狭隘的复仇心理,并对两国专制主义政权的受害者作出补偿。这些“真相”文件将促进拉脱维亚各民族之间更大的和睦,而且我们认为还将使俄国摆脱遗留给它的一些为难的负担。

这些情况已经存在。俄国总统和一些中欧和东欧国家的总统签署的文件标志着过去所遗留下来的问题的结束。这些问题对俄国社会也是一个负担。

我们认为,如果不对1939年和1940年所发生的事件做一个客观的分析,便不可能充分理解苏联的占领造成的后果。在拉脱维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已经并且继续感受到这些后果。没有那个国家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失去将近40%的本国人口;在战后也没有那个欧洲国家象拉脱维亚那样,本国人口在包括首都在内的7个最大城市成为少数,也没有那个国家经受了如此规模的人口迁移和大规模驱逐。拉脱维亚也面临着灭亡的威胁,尽管它部分地以独特地汇集一百多万首民歌的形式存在了四千年。我们希望保护拉脱维亚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因为拉脱维亚人可以只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这片很小的土地上保持它们的民族特性。拉脱维亚人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要求任何其他领土。

我还要提醒大会注意开展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历史已在表明,具有密切地理和历史联系的国家形成了密切的关系,从而丰富和推动了相互的发展。

在独立得到恢复后,我们成立了波罗的海议会大会。波罗的海部长理事会也将在本月开始工作,协调我们在外交、贸易、立法和其他问题方面的政策。换句话说,一个平衡和积极的波罗的海联盟已经建立。与此同时,一个建立有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积极参与的扩大的欧洲联盟的演变进程正在进行。拉脱维亚所期望的北欧区域合作的模式是“三加五”——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加上五个北欧国家。

认识到联合国在国际维持和平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拉脱维亚已同其邻国爱沙尼亚和立陶宛一起建立了“波罗的海营”部队,该部队今后可参加安全理事会的维持和平行动。北欧各国、联合王国和美国为建立“波罗的海营”部

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相信,波罗的海三国将因此促进联合国这一规模最大和最具有影响的国际组织的会员国的共同目标。

冷战期间,波罗的海是一条边界。现在,波罗的海把各国连接起来,而不是分裂。五年前,“波罗的海道路”——一条从塔林经里加到维尔纽斯的人链——象征着通往独立和民主的共同道路。今天,这条道路也在我们地区恢复了它的历史和经济意义。在本世纪末,“波罗的海道路”将成为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上确立的一部分。

我愿重申,拉脱维亚愿尽其最大努力,在波罗的海的海岸上促进和平合作、谅解的精神,以及相互信任与容忍。

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国家之间的睦邻关系同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冷战的结束为用更大的精力处理这些问题创造了新机会。今年春天,秘书长发表了一份题为“发展纲领”的报告(A/48/935)。拉脱维亚欢迎这一倡议,它标志着联合国工作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联合国正从一个主要为个别国家的利益服务的国际论坛,转变成为一个人类需要的代表和捍卫者。经济和社会发展提高我们地球上每一个居民的安全。

我们认为,联合国及其每一个会员国应该看到,我们不仅需要争取民主联盟,而且需要与有组织的犯罪及核材料和毒品走私活动作斗争。不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地球上每一个居民的安全和每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将受到威胁。我请联合国考虑组织一次高级别会议,以解决这些问题。

联合国系统的许多部门,首先是开发计划署,它们的工作是促进经济进步。因此,在拟议的发展纲领的目标范围内,我们的挑战之一是简化、更新和综合联合国系统。拉脱维亚是那些经济、政府和社会结构正在经历一个过渡时期的国家之一。向这些国家提供有效的联合国援助将加快这一进程,让它们更快成为捐助国。

发展的概念非常广泛。它包括社会和经济进步、作为社会基础的正义和民主,以及保护人权和环境。即使全球核大战的威胁已经消退,发生环境灾难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此,我重申拉脱维亚在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地球首脑会议上首先提出的建议,即在本世纪末之前,在拉脱维亚召开一次世界首脑会议,参加会议的国家将承诺把从裁军得到的所有资源用于长期发展,特别是用于保护环境和扭转因军事活动而造成

的生态损失。这次会议可以在波罗的海海岸上的尤尔马拉举行。

拉脱维亚极其重视由联合国组织的国际会议。作为筹备委员会主席团的一员,拉脱维亚已积极投入世界社会问题首脑会议的筹备工作。此外,拉脱维亚是其代表团团长也是会议副主席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每一次全球性会议都是每一个与会国审查和比较它的全部经验的一次机会。在国家国际两级执行已经通过的各项决议的问题,仍然有待充分解决。我愿向大会介绍拉脱维亚遵循在世界人权会议上通过的各项建议的程度。会议在其《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中,请各国建立和加强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会议建议各国考虑起草一项国家行动计划,确定国家将通过哪些步骤改善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的可取性。

拉脱维亚于1994年3月设立人权事务部长职位,并组成了一个关于保护个人权利的政府工作组,为这些目的拨出必要资源,显示了拉脱维亚对联合国原则的承诺以及它准备执行会议的各项建议。我们认为,联合国应该把它的正常预算更多地用于促进和保护人权。

作为对工作组的一项请求的响应,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组织的一个高级国际特派团于今年7月访问了拉脱维亚。特派团成员包括若干国际组织的代表,其中有欧安会和欧洲理事会的代表,特派团就发展一项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国家方案问题,与拉脱维亚进行了协商。应拉脱维亚的邀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将在今年10月访问拉脱维亚。

我自豪的是,拉脱维亚是首先展示认识到其责任的国家之一,它建立了一个保护和促进人权的国家方案。拉脱维亚准备与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和讨论和分享我国的知识和经验。

我们支持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先生向大会提出的建议,即在所有会员国的立法中体现《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的原则。在世界人权大会上,拉脱维亚呼吁为少数民族和外国人的权利建立标准和执行机制。

在人权领域中的这些活动是有历史根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拉脱维亚作为国际联盟的一名成员,就促进和睦的种族间关系。我们现在正在努力恢复和培植这一伟大的传统。拉脱维亚恢复独立后就立即宣布加入所有主要的国际人权文书。象我已经提到的那样,我们正在作出重大努

力,建立一个国家方案,促进和保护个人的人权,以便每一个人都能保证享有平等权利和捍卫这些权利的平等机会。我相信,对于平等机会的概念不仅是个人基本权利的特点,也是发展的一个前提。

拉脱维亚一贯愿意同联合国、欧安会和其他的国际组织合作。拉脱维亚在通过拉脱维亚公民法的时候,又重申了这一点。在颁布这项立法时,拉脱维亚遵循欧安会和欧洲理事会的建议,这项法律的通过已经得到这些组织积极的肯定。

振兴联合国并使其工作合理化的需要正日益明显。拉脱维亚正积极参加寻求最佳的解决办法。拉脱维亚支持扩大安全理事会,认为这是小国加强它们在重要的国际决策中作用的一次良好机会。拉脱维亚也支持改进联合国同其他国际组织——包括欧安会、欧洲联盟和欧洲理事会——之间的合作与协调。我们还对秘书长根据美国的建议建立一套新的、有效的负责与责任制度采取的行动表示欢迎和支持,这项建议的目的是设立内部监督服务。

拉脱维亚尤其对改革计算联合国会费分摊的倡导表示支持。它严格建立在“支付能力”的原则的基础上。这将是改善本组织可怕的财政状况的一个步骤,并且会为公平地解决拉脱维亚和许多其他国家会费分摊的问题铺平道路。

尽管同过渡阶段相联系的不可避免的各种困难在我国经济和社会部门仍然能感觉到,拉脱维亚正努力履行其国际义务和承诺。然而,同联合国的标准作法相违背,在计算拉脱维亚目前分摊份额时,并未考虑到其实际支付能力。相反的,目前在确定拉脱维亚的会费分摊所使用的数据已经是不复存在的国家——前苏联——的数据。拉脱维亚一贯坚定地指出它是被迫加入前苏联的,因而不是并且也永远不能是其继承国并履行由此带来的所有权利和义务。这点在1992年致秘书长的一封信中也曾提出过。

拉脱维亚期待大会在主权平等原则基础上在本届会议期间讨论这一问题。

我们认为,对联合国的普遍性原则也应给予同样的重视。

世界将于明年庆祝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拉脱维亚也已经开始为这个伟大的纪念日进行准备。我们希望,里加杜姆儿童合唱团将在纽约举行的庆祝音乐会上演唱。这将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因为未来的几代人将塑造各国的命运。其命运从多种意义上讲将取决于我们留给各国的遗产。我们必须

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向这样一个时代靠拢:那时国与国将不再进行战争,所有国家都将联合起来与黑暗进行斗争。这一起源于民族智慧之源泉的感情似乎也体现了联合国现在和未来的根本所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愿代表大会感谢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刚刚发表的讲话。

拉脱维亚共和国总统冈蒂斯·乌尔马尼斯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总统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先生的讲话。

主席(以法语发言):大会现在听取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总统的讲话。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总统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向大会发表讲话。

伊泽特贝戈维奇总统(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对塞缪尔·因萨纳利先生对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工作得力的指导表示称赞。

主席先生,我也愿祝贺你当选为第四十九届会议的主席。祝你在执行这一十分重要的任务中取得成功。

我感谢你给我这一机会代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在这一非凡的聚会上发言。

我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是一个目前成为众多讨论的话题的遥远的国家。

不幸的是,不得不以重复一些事实开始我的发言,这些事实对你们很多人来讲可能或应当是熟悉的。

在南斯拉夫于大约3年前解体时,我们曾尽最大努力以一种和平和没有任何暴力的方式实现这种分离,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们的积极努力并未产生结果。

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分离并且南斯拉夫的解体已经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我们曾组织了一次公民投票,以一种民主方式决定波斯尼亚的命运。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公民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确切的是登记选民的64.4%选择了该国的独立,这次公民投票是在1992年3月1日举行的。我国在此后不久便获得国际承认,针对它的侵略也随之而来。承认

它的决定于1992年4月5日作出，并于次日1992年4月6日宣布。塞尔维亚和黑山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侵略始于1992年4月5日，即承认该国的决定获得通过的当天。

这场侵略一直持续到今天，其强度时增时减，看不到它将在不久的将来结束的前景。

这场强加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其各族人民并且到目前已持续了三十一个月的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起初，它本不是一场战争，而是由一支装备优良的军队——前南斯拉夫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公民进行的一次袭击。

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斗的结果如下：我国领土的70%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就被占领；二十多万平民被杀害；一百万居民——人口的四分之一——被赶出家园；数百座村庄被毁坏或烧毁。这无法被描述为两军之间的典型战例。这是一场军队针对平民的战争，随之而来的是种族灭绝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文化和宗教场所的史无前例的毁坏。

世界并未对这种野蛮作出恰当的反应。

世界显得迷惑和犹豫，或许是由于袭击的野蛮，或许是因为它在道义和心里上毫无准备，也可能是因为它卷入了相互矛盾的利益之中。

在有关欧洲中部新集中营的消息和图片刊登时，公众感到惊讶或震惊，但责任者大多保持沉默。数以万计的人在集中营中死去，更多的人无影无踪的消失了。攻击越残暴，世界就越迟疑。自由世界既不保护也不支持自由。面对遭受灭绝的危险和明确宣布的死刑判决，我们的人民决定保卫自己。

但当时，他们遇到了一种新的荒谬现象。他们发现自己双手被捆。简而言之，在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爆发之前，联合国实施了一项臭名昭著的决议，禁止向前南斯拉夫境内出口任何武器。于是，一切都变了：战争开始了，虽然可以清楚地分清侵略者和受害者，但是武器禁运还在实施，好象暂时什么也没有发生。由于侵略者拥有武器——这是在过去40年中储存的——正义变成了非正义，而受害者却手无寸铁，束手无策。

关于武器禁运的决议本身自相矛盾。由于维持武器的不平衡，决议延长了战争，而且使和平谈判成了装备占优势的侵略者提出的解决冲突的苛刻条件。

我们对世界说，“你们无须来保护我们，但至少务必给我们松绑，允许我们自卫。当侵略者屠杀儿童、强奸妇女和毁坏我们所有的文物时，务必承认我们的自卫权”。

然而，武器禁运至今还在实行。我们的保卫者手中只有步枪和手枪，面对的却是大炮和坦克。我们牺牲了許多人，报道表明其中百分之90的人被炮弹和手榴弹炸死。我们的城市和村庄一直受谋杀者手中强大的军事技术的摆布。仅在首府萨拉热窝市，就有1万多人死亡，5万多人受伤。每个家庭都有人死伤。

面对这一切，世界向我们发出了一个信息：谈判。因为我们认为唯一争取的道路是继续保护我们的国土，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世界各国人民会在这场正义战争中支持我们，所以，我们曾长期拒绝与战犯谈判。

最后，面对我国人民无法忍受的悲惨处境和世界的无动于衷，我们别无选择，接受了谈判。结果是，侵略者只是利用谈判来争取时间，掩盖其继续侵略。1993年3月，经过长期艰苦谈判，在我方作出许多让步之后，我们签署了所谓的万斯—欧文计划。侵略者拒绝了这一计划。

接着发生了又一轮流血战争，进行了新一轮谈判，于1994年7月5日产生了一项由接触小组起草的和平计划，该接触小组由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法国、德国和俄罗斯联邦五个大国组成。我们再次选择了和平，而进攻者在此选择了继续战争。

我们接受了不公平的和平建议，以便制止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我们这样做是希望和平计划中的不公正之处还可以在和平年月加以纠正。我们理解波斯尼亚的灵魂，因而曾经认为——而且仍然认为——和平能够拯救——但战争将会摧毁——我们称为波斯尼亚的一切。

我们所称的“波斯尼亚”不仅仅是巴尔干半岛上一小块土地。对我们许多人来说，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不仅是一个家园，而且是一种思想，是一种信仰，即不同宗教、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传统的各民族可以共同生活。如果这一理想遭到永久埋葬，如果该地区各民族间互相容忍的这种思想遭到不可弥补的抛弃，有罪的不仅仅是那一些30个月以来用大炮残酷屠杀波斯尼亚人的人，而且还有世界其他地方许多本可以提供帮助却不愿提供帮助的许多强国。

两天前，我离开了萨拉热窝。我没有坐飞机离开，因为机场被关闭。我只好走陆路，穿越经常遭到炮火袭击和每天打死许多人的森林。萨拉热窝市接连几天断电断水，停止供应汽油。该首府遭到完全封锁，实际上正在死亡。

昨天我到达联合国总部之后，收到了从德里纳河畔的

一个小镇斯布雷尼察发出的一封信。此信应是一份报告，但也是发自真正人间地狱的呐喊。这封信我没有气力读第二遍。

三个多月以前，“种族清洗”再次点燃，现在出现了种族清洗的新浪潮。在卡拉季奇军队控制下的巴尼亚、卢卡、比耶利纳、亚尼亚和其他城镇，数以千计的平民因为不是塞族被赶出家园。国际社会又一次没有采取行动。世界似乎逐渐习惯于不惩罚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的行为。这种令人伤心的状况涉及世界上所有人，无论他们离波斯尼亚多近或者多远。

我长期拒绝——实际上我还拒绝——任何所谓的阴谋说法，即波斯尼亚发生的一切是因为穆斯林是多数民族，黑暗势力有意驱使塞族来灭绝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支持这一观点的人有自己的论据，我想以前在此也听他们说过。他们认为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实行的是公开侵略，之后是种族灭绝、集中营和其他形式的最黑暗的法西斯主义，世界准是瞎了眼没有看见。难道世界瞎了眼吗？难道世界有意宽恕这一切邪恶吗？世界不可能瞎了眼，因此答案只能是另一种。他们的论点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如果世界上数十亿穆斯林接受这一论点，将不会是件好事。

最近围绕接触小组计划发生的事件给了所谓阴谋说法的支持者又一个理由，即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提出的建议得到了五大国的支持，因而得到了国际社会多数国家的支持，而且以明确指出直接计划的一方将受到惩罚而接受一方将得到保护。然而，发生了相反的情况：塞族拒绝了计划，得到了终止制裁的奖赏。我们接受了计划，却受到了萨拉热窝遭全面封锁的惩罚。两种进程是同时发生的。

今天，联合国最高民政和军事当局正在警告我们：如果你们要求并成功地实现解除武器禁运，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将撤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等等。

我长途跋涉，历经艰难，从波斯尼亚来到美国当然不仅仅是为罗列在座大多数人所熟知的事实。我们波斯尼亚认为尽管存在困难，善良和正义不可能失败。我们没有抛弃我们的信念，即世界能够更加美好，我们大家应该不断努力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本着这一信念，我不顾一切失望和挫折，来到这里向大会发言并提出我们的一些主张。我们向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提出下列要求：第一，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关于波斯尼

亚—黑塞哥维那的所有决议应该得到执行；第二，应有效的采取措施监督塞尔维亚和黑山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之间的边界，以便及时防止或发现任何跨越该边界的部队、武器和军事设备的运输；第三，如果发生这种运输，就应立即撤消关于暂停执行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某些制裁的决定，即安全理事会第943(1994)号决议，并根据1994年7月的接触小组计划实行更严格的制裁措施；第四，在塞尔维亚和黑山承认国际公认边界内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之前，将不进一步放宽对它的制裁；第五，应毫不拖延地通过一项决议，以便加强保护，并授权延长安全理事会第824(1993)和836(1993)号决议所规定和根据接触小组计划第6条的规定建立的安全区的有效限期；第六，应该作出决定保证立即停止对萨拉热窝的扼杀，并防止这种局势重新发生。

其中最后提到的这些措施应该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设想，在交通要道两旁各建立一条宽2.5公里的非军事地带，以便沿着包括公路和高速公路在内的北部交通要道开放该城市。只有联合国军队和警察可以留在这条非军事地带。北大西洋条约组织1994年2月9日决定中的第4条规定了使用武力制止对萨拉热窝的扼杀的可能性。

如果上述条件得到满足，而且联保部队继续执行其任务，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政府将愿意接受一个新的和经过修改的方案，来处理武器禁运问题。根据这个方案，我们将把我们关于取消武器禁运的要求局限于通过一项正式的决定，该决定将推迟六个月实施或产生后果。在这一情况下，联保部队可以继续留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接触小组将履行其诺言，并且将向卡拉季茨的塞族人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

最后，我想申明我们的两项承诺。

第一，我们的不可改变的目标是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建立一个民主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使其所有公民都充分享有种族、宗教和政治权利。在这样一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族人将享有所有权利。直至最高水平的自治权利，但是，他们不能建立国中之国。

第二，我们认为，我们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有不可剥夺的自卫权利。因此，如果我们关于武器禁运的妥协提议因任何理由被拒绝，我们将请我们的朋友们设法立即，甚至单方面地取消禁运。不幸的是，我不得不通知各位代表，我今

天刚刚获悉,这个妥协提议正受到某些接触小组国家的抵制甚至反对。

最后,我借此机会向支持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为生存和自由进行斗争的所有朋友们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总统刚才的重要讲话。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总统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 议程项目9(续)

##### 一般性辩论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比利时总理兼外交部长威利·克拉斯先生发言。

克拉斯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高兴地象前几位发言者一样祝贺你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你所代表的伟大非洲国家,科特迪瓦,一贯在我们的组织中发挥着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由你主持我们的会议使我们感到高兴。

我的德国部长级同事克劳斯·金克尔先生今天上午代表欧洲联盟作了发言。他的发言忠实地反映了我国代表团的观点,因此,我没有必要讨论他已经概述的立场。

五年以前,人们谈论的是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当时震撼东欧的事件使我们认为,旧的两极世界已经结束,另一种秩序必将取而代之。对有些人而言,对侵略科威特所作的反应标志着这个新阶段的开始。现实并非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今天,我们逐渐认识到,以两极世界为基础的平衡并没有一个“自然的继承者”,我们有责任逐渐地并通过不断摸索来建立一个新秩序。

当然,在世界一些地区正在出现一种新的平衡。

首先,是在中东发生的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件。即使华盛顿和开罗协定执行证明如预料的那样是艰巨的,但每一个新阶段是走向持久和平的重要一步。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历史性和解加强了这一前景。

副主席塞尼洛利先生(斐济)主持会议。

新的南非也面临着种种巨大的挑战,但同时它已成为整个非洲大陆的希望之光。

在拉丁美洲加强民主和在区域一体化方面取得的进展对

我们来说是又一个有意义的演变。该地区的若干国家现在已找到了走向持续经济发展的道。

亚洲也是一样,而且在那里正在存在着一种对话的意愿。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发起的区域性讲坛,朝鲜半岛的接触活动,以及在另一个级别上台湾海峡两岸之间的对话,这些都促进了一种新的信任的气氛。

准备欢迎四个新会员国时,欧洲联盟已经同中欧和东欧大多数国家签署了合作协定,而最终可能使它们成为正式的成员国。与此同时,正同俄罗斯结成新的地缘战略关系。

这种同样的对话的愿望也反映在有关本组织前途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之中,例如安全理事会的改革。即使在各个点方面依然有着不同的意见,共同利益的意识还是占了上风。

比利时主要关心的问题仍然是使安理会具有更大的代表性而又不降低它的决策能力。因此我们赞成避免采用那些将在根据不明确的标准使几个“区域性大国”得到特权地位但却不能增强安理会担负起其职责的能力的雄心勃勃的方案。

作为第一个步骤,为何不根据一致同意的标准来调整安理会的成员组成?作为一种可以立即产生有利影响的措施,国际社会可以增加一个非常任理事国席位给那些认为自己未被充分代表的区域,并且将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给予其对世界事务的积极贡献早就受到公认的两个经济强国。

这些步骤,不管它们如何令人鼓舞,其本身并不构成一项新的国际协议。进步和和解的意愿完全没有成为普遍的行为:中非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就说明了这一点。

卢旺达的局势最使我们感到关切。这一局势在布隆迪和各邻国中所造成的破坏稳定的威胁已经成为最近几个月来不断令人感到不安的根源。不管这些最近产生或者是在遥远的过去产生的仇恨有多深,和解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呼吁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杰出的公民一致做出努力来扩大政治权力的基础并坚决反对极端主义份子。只有在这些条件得到满足的时候,紧急援助才能够让位给持久的重建。自然,我国将对这一重建的每一个阶段作出贡献。

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内战最初是使欧洲,然后是使整个世界深深地陷入混乱之中。但三年多以来,我们一直在不懈地努力结束这场悲剧。联合国保护部队已成为本组织迄今为止所建立的最大维持和平行动之一。联合国和欧洲联盟已经孜孜不倦地共同努力以找到一种通过谈判解决的办

法。几个主要大国已对这些努力施加了它们的影响。让我们希望欧洲联盟、美国和俄罗斯联邦最近作出的努力最终能成功地制止这场流血。我要在这个讲坛上呼吁各方抓住这一机会：结束疯狂行为，让和平回来。

刚才我只是简单地谈到了种族仇恨已导致特别野蛮行为的两场内战的事例。我们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在人权遭到蓄意破坏的时候保持坚强不屈的态度。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消除每一个建立在“种族清洗”行径之上的政权。

为了使人们永远不忘记这一教训，比利时赞成确立一种国际刑事管辖权，并表示希望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使这一管辖权尽早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我们认为对前南斯拉夫境内所犯的战争罪作出判决而设立的法庭将作为一个宝贵的先例，而我们想见到它尽早延用于在卢旺达境内犯下的罪行。

同样，我国政府对任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欢迎。阿亚拉·拉索先生发起的行动倡议——例如向卢旺达派遣人权监察员——已经获得了比利时和其他一些国家最早而具体的支持。我相信，阿亚拉·拉索先生的行动将增强对人权的尊重并促进在世界各地政治领导人和人权积极分子之间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这种对话将考虑到各种文化和宗教所启示的相互不同的态度。但我认为，如果对话要在一个根本上即对每个人的身体和道德完整所应有的尊重作出妥协，它就会失去它的意义。

对于比利时来说，卢旺达的危机已经成了国际议事日程的标志。在种族灭绝之后，死亡盲目地向流亡的人口袭击，把已经到达波斯尼亚和索马里的恐怖的界线推进了一步。我国同胞深感忧虑的是，如此多的发展努力遭到了毁坏，如此多的和解试图遭到了失败。今年年初以来有100名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人员遭到了杀害，其中有10名比利时“蓝盔”遭到了野蛮的杀害。这突出地显示了维持和平行动显然是脆弱的。我认为纪念所有这些牺牲了生命的人的最好的办法，是要特别对国际行动的界限和可能性进行考虑。

在这方面，比利时参与的在前南斯拉夫、索马里和卢旺达的共同经历已使我们有时是在悲剧的情况下提出若干条意见供今后使用。我打算把它们围绕在我看来是重要的四项原则进行分类。第一，维持和平行动不能够临时凑成；第二，一旦决定了，它们就应该给予实现其目标的手段。第三，为了使这些手段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应确保它们在行动和政治方面

的前后一贯性。最后，只要有关人员的安全不能得到保证，就越来越难以找到为维持和平行动提供部队的国家，因而将使它们成为完全是理论性的工具。

“不临时采取行动”的原则有两个含意。

第一个含意是，本组织必须在任何时候能够调动必要手段进行维持和平行动并且为此目的依靠所有会员国的团结。这意味着十分必要加强本组织维持和平的军事能力。在没有可快速部署的联合国多部队队的情况下，普遍提供后备部队和装备以及统一装备和程序是我们必须勤奋谋求的目的。为此，我已向秘书长递送了一份比利时可为维持和平行动提供的援助清单。

第二个含意是，虽然团结仍是设想和实施维持和平的基础，这种团结不可能是盲目和自发的。每次特别行动必须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在设想和认真考虑发起维持和平新行动之前，必须已用尽解决危机的其他手段，包括地区性手段。《宪章》第六章以及《和平纲领》为通过谈判、仲裁及其他方式解决危机提供可广泛选择的手段。那些忘记维持和平行动不是灵丹妙药的人对本组织起了损害作用，并常常不知不觉地促进局势的恶化而不是促进其解决。

一旦安理会已作出决定，维持和平行动便成为每个人的事。所有会员国必须根据它们的可能和情况的要求作出贡献。当然，会员国必须保留决定是否参加某个维持和平行动的主权。但在这样做时，它们的衡量标准不应仅是国家利益。

所有会员国应积极合作，协助部队的调动，供给和增援以及后备部队的预先部署，以使行动获得成功。所有会员国应使用它们的外交影响以帮助秘书长实现行动的政治目标。最后，所有会员国必须履行对行动的财政义务。

第二，维持和平行动必须在有关各方同意、适当灵活性和掌握充分信息的基础上运作。

每个行动必须建立在合法卷入各国的协商一致意见之上。行动的部署和目标必须得到冲突各方同意，明显人道主义灾难的情况除外。在这种经常出现的情况中，安全理事会在传统授权范围之外和不顾三个通常条件——即有关各方同意，政治进程和停火——采取行动的決定必须极为慎重地作出。安理会必须在授权中明确说明这项决定并且接受其一切后果。



一个行动必须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安全执行任务的必要力量。这项规则极为重要。它的含意是,从一开始便有充分人力和灵活作战规则以应付未预料到的情况。它还意味着应有足够装备以完成使命和对紧急情况作出反应。在冲突地带附近部署军事后备部队的益处已被证明,例如在索马里,这是我们今后应经常事先考虑到的预防措施。作为一项规则,受当地挑衅的部队必须始终有撤离或原地不动、撤退或迅速回击的选择。

但是,为了劝阻对维持和平行动的抵制,所考虑的第一选择并不是使用武力。对在维持和平行动的目标经常得到错误消息甚至被误导的人们,教育和说服会产生奇迹。经验证明绝对必要制定一个有条理的信息战略。每个维持和平行动应设有一个信息支队和广播其信息的电台。另外,每当敌对宣传威胁一部分居民或联合国人员的安全时,就应使用抵销这种宣传来源的能力。

第三个考虑是,指挥和控制结构的统一以及与部队派遣国的经常性协商是行动成功的必要条件。

对行动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必须归于联合国或具有恰当授权的机构。这项原则有两种结果。

任何部队或小纵队指挥员仅直接向该国当局汇报将减损多边行动的统一性。指挥员在战地处理预想不到的情况所需的灵活性是另一回事。

任何地区或多边部队的行动必须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授权。但是这种授权不应减弱行动指挥员的作战自主性。必须给予冒风险的人控制权。

此外,应为每项行动设立磋商委员会部队派遣国,安全理事会成员和秘书处可在该委员会定期会晤。这个委员会可使派遣国更好地协助秘书处管理行动。

这可使派遣国与安理会成员在每次后者作出修改行动基本条件时进行真正的对话。派遣国通常更了解行动实地的局势并更有条件判断新任务是否可能或可以接受。没有部队派遣国的参与,安理会的任何决议都是徒劳无益的。

第四和最后的考虑是,部队派遣国和秘书处一样地关切蓝盔士兵的安全。必须有效率地组织对袭击维持和平部队人的起诉。

一国政府对其派出部队的责任不止于将其派往行动实地。部队派遣国有权利自始至终地注视其同胞的安全。安全最终一定是派遣国继续或停止参与维持和平行动的决定性因

素。

因此,提供部队的国家应该有权从一开始就为其特遣部队提供充足的防御武器,这似乎是正常的。以后,当出乎意料的情况使特遣部队处于真正危险局势时,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必须立即调整任务,必要时还必须调整参战规则,以适应该局势。

组织对攻击联合国人员者的国际起诉是联合国的一项基本义务。迄今对犯下此类罪行的人不加惩处已使人们感到不安并破坏了在世界舆论心目中的联合国的信誉。联合国对其努力调解的各方具有的权威也因此受到消极影响,提供部队的各国政府越来越感到担心。我们认为,必须加快通过一项有关联合国人员安全的公约并对攻击联合国人员者进行调查和有效起诉。

我希望,我向大会阐述的这些思想将有助于改进程序并加强联合国实施的各种手段,以便正视他必须处理的各种新局势。实际上,应该在修改《宪章》时正式体现这些变化。这将大大改善维持和平行动的运作。

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曾经写到:

“在适用人类社会的诸多法律中,有一部法律似乎比所有其他法律都更加明确、更加确切。如果人类要保持文明或变得文明,那么结社的艺术就必须与其条件的平等同样的速度增长和改善”。

虽然这种“结社的艺术”首先影响各文明社会,但它也是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成为我们各国政府的一种关切。毫无疑问,发起维持和平行动就是这种共同行动艺术的一个最慷慨的表现。

同时,我们也能够在困难的政治、财政和物质条件下成倍增加维持和平行动,这完全是奇迹,为此我们必须向在秘书处和实地不懈工作的所有人致敬。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日本副首相兼外务大臣河野洋平先生发言。

河野先生(日本)(以日语发言;英文文本由代表团提供):首先,请允许我祝贺阿马拉·埃西先生当选其新职务。我还要向他的前任因萨纳利大使在一个重要变革的时期里所表现的杰出外交技巧致敬。我还要高兴地衷心祝贺南非共和国,该国抛弃了种族隔离,已在大会上届会议上重新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

人们现在期望联合国起比过去更大的作用。忆及国际

社会在日本加入联合国时给予他的祝福,我打算奉行一种未雨绸缪的外交政策,使日本能够在与其政治和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水平上为人类的未来福利作出贡献。

首先,我要谈一谈日本对其国际贡献的基本哲理。日本为铲除贫穷和实现经济发展,并为防止冲突和消除不稳定因素,已进行经济援助和各种其他努力。

痛悔反省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从未放弃其对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承诺。日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诉诸使用武力,这是其《宪法》所禁止的。日本将坚决保持一个和平国家。日本既不拥有核武器,也不出口武器。它将继续积极参加裁军和不扩散的各项努力。根据上述,日本应联合国的请求,已向包括柬埔寨和莫桑比克在内的一些国家派遣其自卫队成员和文职人员。日本打算继续同此类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积极合作。

同时,日本决心为解决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全球问题的各项努力作出更大贡献。这些其重要性现在已被广泛承认的问题包括发展、环境、人权、难民、人口、艾滋病和麻醉品。

今天,联合国应集中其努力焦点的第一个领域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第二个领域是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国际社会如果要有效地执行这两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就必须执行第三项任务,即促进联合国的改革。我要在此概述我对日本并在这些领域作出贡献的看法。

在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个联合国关心的第一个领域,日本非常重视裁军和不扩散,解决冲突的外交努力和维持和平行动。

作为遭受核攻击的唯一国家,并坚定地严守其三项非核原则,日本正在努力实现消除所有核武器的最终目标。为此目的,日本敦促所有核武器国家加倍努力减少其核库存。另外,日本支持无限期地延长《核不扩散条约》,并要求尚未加入该《条约》的各国尽早这样做。

同时,我特别敦促所有核武器国家更积极地就全面禁试条约进行谈判,并努力使谈判早日圆满成功。我谨提议,条约谈判工作一旦结束,在日本,例如在广岛市举行一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签字仪式,并使其成为一个一劳永逸铲除核武器的新起点。

在这方面,日本强烈要求北朝鲜作出认真努力,以便通过国际对话,包括同美国会谈,解决其发展核武器问题。

不受阻碍地转让和过多积累常规武器是当今世界许多区

域的另一个破坏稳定因素。例如,我们在非洲某些区域和其他地方所目睹的内战中,这个因素已导致战斗升级和大批人死亡。我认为,国际社会必须认真考虑具体措施,以解决这个问题。

在此方面,旨在改进武器转让透明度的《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成为衡量在全球一级建立信任的有效标准。80多个国家目前参加了《登记册》,我们强烈希望更多的国家将参加。日本将同其它会员国一道扩大和加强《登记册》,例如使它也包括军火储存。

预防和解决区域冲突需要采取综合方法,把外交努力、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道主义援助、建立社会体制的援助、诸如恢复和重建援助之类的建设和平的援助结合在一起。

我深信在冲突变得难以解决之前采取措施的重要性,我强烈提倡大力促进预防性外交。从这个观点出发,我认为我们应当同有关国家合作,积极考虑提供援助,以稳定存在不稳定因素的区域和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条件。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在柬埔寨和许多其它区域已证明是成功的,这些活动可望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提高维持和平行动的有效性将需要更仔细地审查,除其它外,它的授权、时间、活动规模和费用,以及充分考虑人员的安全。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财政基础是一项紧迫的任务。拖欠会费的会员国特别需要支付其分摊会费。也必须想办法使维持和平行动获得更健全的财政基础。

就日本而言,我国将加强对民主化的支持,以帮助和平在战争结束之后生根发芽。我国特别重视协助进行自由和公正选举的努力。

日本考虑到卢旺达难民无法描述的悲惨情况,通过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提供了财政援助和物质支持。日本政府已决定派遣400多名自卫队成员到该区域去,在医疗、供水和空中运输等方面提供援助。其中这些活动已经开始。日本同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国家——一道努力,决心继续为解决卢旺达问题作出努力。

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冲突,日本继续支持国际社会为恢复和平所作的努力。我国呼吁争端的所有有关方面接受接触小组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制定的和平计划,并同联合国在那里的活动进行合作。

联合国的第二项任务就是解决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问

题,包括有关发展、环境与人权的问题。

关于变化中的国际形势,发展问题现在重新成为全球关心的问题;因此,需要制订一项新的发展战略。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日本一直在提倡采用综合方法的发展战略,把援助、贸易、投资和技术转让、以及根据发展中国家各自发展阶段的需要采取的不同方法结合起来。

去年在东京举行的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证明是一个有益的论坛,以便讨论如何能够确定这样一项发展战略。为了在那次会议结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将于今年12月在印度尼西亚召开一次亚非讨论会。

在当今世界,南南合作越来越重要,在这种合作中较先进的发展中国家同其它发展中国家分享其经验和技能。日本打算为在全球促进南南合作提出具体的计划。

此外,作为世界最大的捐助国,日本继续努力扩大其官方发展援助。在提供这类援助时,我国充分考虑到诸如受援国军事开支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发展与生产的趋势之类的因素,以及该国促进民主和引进面向市场的经济的努力。

我希望,在大会本届会议上将能够就发展议程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并且我刚才提到的各点将能够得到考虑。

在全球相互依赖日益增长之际,全人类面临着新的挑战,例如环境与人口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努力加以解决。

就日本而言,我国积极地参与保护环境的努力。例如,我国正在努力加强这种努力的国际框架,把相关技术转让给发展中国家,并扩大和加强其环境领域中的官方发展援助。至于人口与艾滋病,日本在今年2月发起了《全球问题倡议》,根据该倡议,我国正大大扩大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援助。在最近于开罗举行的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上,我强调了寻找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的重要性。

日本非常了解,通过国际合作开发人力资源和进一步提高妇女地位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迫切地期待着将于明年召开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和世界妇女会议的圆满成功。同样,日本积极参加联合国各机构管理的发展中的妇女方案以及其它社会发展活动。

经济发展和人权可被比拟为一辆车的前轮和后轮;它们必须相互配合推动民主社会的发展。为了鼓励把人权尊为普遍价值并有效改进每个国家的人权状况,除了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之外,应当不断努力建立法律制度并提高人权

意识。为此目的,日本将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进行合作,配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工作。

联合国为了有效执行其两项主要任务——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and 解决经济及社会问题——它必须认真努力适应新的时代,进行结构改革和行政及预算改革。

在联合国力求通过改革加强联合国活动的时候,安全理事会的改革特别重要。今天安全理事会的活动覆盖与世界和平与安全有关的广泛问题。虽然从1945年到目前,联合国会员国的数目已从51国发展到184国,但安理会的组成情况基本上没有变化,这种安排原先是为了反映联合国成立时的世界局势。在此期间我们已看到有能力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的国家。因此,有必要在确保安理会效率的同时,改革和加强安全理事会,使它能反映世界的现实。

根据我在前面概述的日本对于国际贡献的基本思想,我愿声明,日本准备在许多国家赞同的情况下,作为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履行其责任。我希望联合国会员国在本届会议期间加快对该问题的讨论,并在明年纪念性的大会第五十届会议之前,及时达成一项改革计划。

安全理事会并非唯一需要改革的机构。由184个国家参加的大会也需要得到振兴,大会必须同其他各联合国机构更密切的协调活动。最近已开始努力,调整联合国在经济和社会领域中的活动,如发展、环境和人权领域,并在这些领域中建立明确的优先次序。这些问题对人类未来具有重大影响。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必须继续努力,在职能和组织上加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相比之下,托管理事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我认为,在整个联合国改革的范畴内,可以考虑取消这一机构。在大会上届会议上设立内部监督事务厅的基础上,我们必须加倍努力,促进行政和预算改革。

《联合国宪章》签署过了半个世纪,时间已使所谓的“前敌国条款”失去了意义。日本继续寻求在《宪章》案中铲除这些条款。

我今天的发言集中于摆在联合国面前三大挑战: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以改革联合国组织的必要性。如果联合国进行改革以符合时代变化的需要,支持联合国会员国之间的合作,我完全相信,联合国将加强它作为一个普遍性组织的合法性,形成更有效的应付新挑战的能力。

最后,我谨呼吁所有会员国合作,确保这次大会成为将

为联合国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历史性会议。

主席(以英语发言): 下一位发言者是葡萄牙外交部长若泽·曼努埃·杜拉奥·巴罗佐先生阁下。

杜拉奥·巴罗佐先生(葡萄牙)(以葡萄牙语发言,英文稿由代表团提供): 我高兴地热烈祝贺阿马拉·埃西先生当选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主席。从他的当选,我看到了对友好的非洲国家科特迪瓦在国际舞台上所起的作用的承认,以及对他的个人品质和经验的肯定。

离任主席塞缪尔·因萨纳利大使也应该得到赞扬,感谢他在上次大会期间热忱和积极的服务。

我再次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敬意,能以稳健和矢志不移的方式履行他的使命。正如他已经知道,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目标,在巩固联合国系统实质性改革方面,葡萄牙是可以指望的。

我的德国同事已经代表欧洲联盟12个成员国在大会上讲了话,他阐述的立场葡萄牙完全支持。然而我愿谈一些对我国特别重要的问题。

两极时代的结束反常地给集体安全体制带来了更大的不可预测性和不肯定性,最明显的是已导致极端民族主义东山再起,造成了新的冲突焦点。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我们对联合国与各区域性组织的机制之间合作的重视。这种合作贯彻相辅相成行动的概念,使我们能够采用适合具体情况的更加灵活的解决办法解决问题。

走向稳定的道路和一种新的安全概念的逐步发展,也需要经过刺激能保障尊重普遍公认的各种价值的政治机构。同样,对使用武力实行更大的国际管制不仅需要最好和最充分的手段,还需要不断更新政治合法性,以便行使这些手段。我认为,这一合法性与建设一个以促进和平、民主和安全的理想为基础的国际社会的目标是相连的。

我们还必须铭记威胁国际稳定与安全的各种问题的社会经济层面。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采取一种综合的做法,在其中把预防工作放在优先地位,不论是在纯粹的政治和外交方面,还是在发展援助方面,都应如此。

在此方面,我们强调所有国家坚定地投入参加一项发展纲领,如秘书长邀请我们作的那样。今天,教皇的预言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正确:“发展是和平的新名称。”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不仅是重新思考发展援助的作用,而且要重新思考发展概念本身。它应该变得更加全

面,包括尊重民主价值和人权,以及社会和经济问题和其他与保护环境、人口统计、预防传染病和打击毒品走私有关的其他问题。

这里,我们也必须强调我们对帮助那些真正承诺执行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和政治经济改革的国家的重视。然而,这一进程必须辅以一套日益自由的国际体制,和一套争取减轻外债负担,为重新活跃对其经济中的私人投资创造条件的措施。

在这方面,我欢迎在马拉喀什签署乌拉圭回合协定和将要开始运作的世界贸易组织,他们将同时加强各种规则和纪律,使贸易更加自由。

作为欧洲联盟的一员,葡萄牙坚决捍卫扩大欧洲联盟,加强同中欧和东欧及地中海盆地其他国家的联系。对整个大陆来说,欧洲联盟无疑是一股巩固民主理想,稳定繁荣和尊重人权的最大力量。

其他组织,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西欧联盟和欧洲理事会同样促进这些理想。如果说,东欧的民主化也为今后加入欧洲联盟创造了可能性,那么,也已经为欧洲大陆的安全带来一种新关系。

我们理解中欧和东欧许多国家已经表达的希望加入防务与安全组织的愿望。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会考虑逐渐均衡地扩大北约,以接纳与我们有着同样民主价值观、尊重人权和法治的那些国家。但是,北约向东扩大的问题不能使重要的跨大西洋这一特点蒙上阴影,因为这一特点必须继续成为欧洲安全的基石。另一方面,北约成员国的任何增加决不能在欧洲制造新的分裂。因此,葡萄牙确认,必须探索“和平伙伴关系”的各种可能性,因为这一机制旨在使欧亚地区的国家统一进行军事合作活动。

去年,我在这里表示葡萄牙认为《核不扩散条约》对国际安全至关重要。在1995年审查会议即将到来之际,我谨重申我国政府将支持有助于无条件、无限期展延这一文书的所有努力。

谈到安全,我愿欢迎并支持克林顿总统昨天在这里宣布的关于达成一项减少杀伤地雷扩散的协定的倡议。这项倡议再及时不过了。就我国来说,我可以在此宣布,葡萄牙正在起草一项取缔此类武器及其生产商业化的法律。

关于欧洲,我不能不提一下前南斯拉夫的局势,尤其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可怕冲突。尽管为结束这一局势

进行了各种努力,但战争仍在进行,造成惨重的死亡、破坏和苦难。

国际社会已表明,它在寻求政治解决该冲突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一进展是不够的,直接有关的各方如不表现出真正的政治意愿,就永远找不到一种稳固、持久的解决办法。

葡萄牙通过提供人力和物力积极参与了国际社会的努力,而且只要有助益和必要,葡萄牙将继续参与。事实上,我们正在西欧联盟活动的范围内加强驻留在该地区的葡萄牙分遣队。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与我国有着特别牢固的文化和历史联系,它仍然是世界上发展水平最令人担忧的地区。葡萄牙仍然坚决认为,国际社会应最优先重视非洲,因为它需要克服的问题的严重性是独一无二的。但是,非洲人自己必须首先证明欠发展不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朝着这一方向可以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坚决致力于和平解决目前存在和潜在的冲突,继续深化非洲政治及社会民主化进程,并进行必不可少的经济改革。

南非的首次自由民主选举、纳尔逊·曼德拉担任其国家元首以及民族团结政府的建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这不仅因为它们废弃了种族隔离,而且因为它们已证明在非洲和平解决复杂局势的可行性。葡萄牙积极参与了支持南非民主过渡进程的一切努力,而且在该国居住的大量葡萄牙人。因此,我们对新南非表示热烈祝贺。我们相信,南非的人力、经济和技术潜力无疑将成为整个南部非洲经济复苏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莫桑比克出现的迹象也表明莫桑比克人民对和平进程的希望将不会落空。集合和遣散军队进程的完成、在拖延了一段时期后新的武装力量的建立,以及以和平方式进行的竞选运动都是必须承认的重要成就,预示着1994年10月27日和28日举行的竞选对莫桑比克的前途来说将是至关重要的时刻。

我们呼吁莫桑比克各主要政治力量寻找对话和谅解的形式,以确保充分尊重民主原则的真正的民族和解。

在谈判中葡萄牙充当了观察员,并派代表参加了和平协定所设立所有委员会,在新军队的建立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且深入参与了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联莫行动)。

葡萄牙仍将在协定的范围内密切关注这一进程,我们认为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不仅在这一特殊阶段,而且在紧接着我

们希望实现的国家重建与和解阶段支持莫桑比克。

在南部非洲,世界上历时最长、破坏性最大的冲突之一仍在肆虐。安哥拉仍然是一切已经夺去几十万无辜受害者生命的战争的战场。

作为三个观察国之一,葡萄牙将继续尽一切力量积极支持秘书长特别代表为最终解决安哥拉冲突而进行的联合国调解。我愿借此机会对他的努力表示致意。

国际社会不会也不绝不能忘记目前冲突的根源,这一冲突使安哥拉人民在《比塞塞协定》和1992年9月选举后产生的希望遭到破灭。现在更重要的不是指责哪一方,而是不放弃结束这一可怕冲突的努力。

旨在尊重和平协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定的范围内在安哥拉促进真正和解的卢萨卡谈判已到了关键阶段。

安哥拉政府和安盟完全接受关于民族和解的一整套调解建议是重要的一步。必须给予安哥拉第二期核查团必要的手段完成其使命。为此,必须在协定草签之后立即派驻适当的部队,并确定这一维持和平行动的适当规模。

无论如何,除非安哥拉人本身有真正的意愿,否则就不能实现和平。

我在此呼吁安哥拉政府和安盟尽一切所能,不丢掉这一机会。

我还要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其承诺和支持。

尽管安哥拉冲突继续存在,南部非洲正在进行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各种可能性。必须巩固和发展这些可能性。

葡萄牙从一开始就支持欧洲联盟与非洲该地区进行对话的项目。这一想法是欧洲联盟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最近举行的柏林会议刚提出的。《柏林宣言》指出,这一对话的目标包括促进贸易、投资与合作的发展,以促进该地区的均衡发展,从而推运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进步。

卢旺达的严重局势表明,非洲统一组织通过实施去年7月29日开罗首脑会议建立的预防、处理和解决冲突机制在防止类似局势方面发挥的作用何等重要。葡萄牙从一开始就支持设立这一机制,并与非洲国家和其他持同样观点的国家一起准备积极参与寻求各种手段,使这一机制发挥作用。

在谈到非洲时,最后我还要对在几内亚比绍举行的第一次民主和自由选举的方式表示欢迎,并对在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为将在几天后举行的选举而进行的竞选过程中出现的和平和有秩序的气氛表示满意。

目前我国外交政策的重点之一是与那些和我们一样说葡萄牙语的国家一道作出共同努力。我们正与它们一道建立一个共同体,我相信,这个共同体将代表那种新的堪称楷模的政治现实。

我们还谋求加强欧洲与拉丁美洲之间的政治对话与合作。这一合作本身的机制已经制度化,其中我想提及欧洲联盟与里约集团之间的对话和伊比利亚—美洲首脑会议。这些活动又使被紧密的历史和文化纽带以及共同的感觉连接在一起的国家给予就它们共同关注的政治问题开展坦诚的和深刻的讨论。在哥伦比亚卡塔赫纳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再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我高兴地再次称赞在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出现的朝着民主和尊重人权的明确发展。这一积极的发展与海地所出现的那些令人震惊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目前在那里,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授权的多国部队干预后,正在为重新建立民主的宪法秩序创造条件。

葡萄牙继续特别关注北非局势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主张根据《欧洲理事会里斯本宣言》同该地区各国保持和睦关系。我回顾,该宣言确定了欧洲联盟和马格里布之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关系的新构想。在科孚举行的欧洲理事会会议特别重视地中海区域的稳定与安全。在这一会议之后,我们重申我们致力于同该区域各国开展对话并加深同他们的联系。在我们考虑到将葡萄牙和北非连接在一起的毗邻的地理位置和密切的历史联系时,我们也不能为任何其他的做法辩护。

事实上,地中海两岸的国家应该加深它们之间的对话,以便避免我们所反对的一种思想的扩散,这一思想就是各种文化之间会发生冲突。相反,我们应该重视这样一种思想,即具有不同政治思想、其居民信奉不同宗教的国家能够建立信任和真正合作的关系。

我认为,我们今天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在中东将实现全面的和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以及以色列和约旦之间已经签署的协定证明了他们谋求建立一个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决心。已经取得的成果当然将推动各方新的主动行动。从这一点讲联合国的决定和决议应该反映已经出现的积极的事态发展。

国际社会,特别是该区域各国还必须支持正在进行的努力。我们希望,在双边和多边范围开展的和平进程所取得的

进展预示着有能力在世界这个地区开创一个稳定与发展的新时代。

葡萄牙人的思想和行为始终具有全球主义的特征。在亚洲,葡萄牙与一些国家有着数百年的联系。我们希望保持并发展这种联系。我们非常钦佩地看待该大陆一些地区的发展。我们相信,该区域各国将在决定我们星球的命运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葡萄牙高度重视尊重人权,所以把尊重人权看作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支柱。我们的行动以维也纳世界人权会议的结果为固定参照点,反对任何既定准则的倒退或削弱。我们支持高级专员和人权事务中心的工作。为了使这些机构能够有效履行它们的职责,应该向它们提供必要的财政手段。

我们以特别的决心捍卫运用于尊重人权及其不可分裂性的普遍性原则。我们反对使严格遵守人权从属于其他目标的任何企图。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也不应让步。我们认为,民主、尊重人权和发展是相互加强的。

我们高度重视将于1995年举行的下列国际会议: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和世界妇女大会。我们认为,最近在开罗举行的国际人权与发展会议取得的积极成果是富有希望的。我们对此表示欢迎。

在人权方面,联合国一直特别突出地将自决权包括进去,我感到我还必须谈谈国际社会日益重视的一个问题。我指的是东帝汶非自治领土。我在大会重申,除了维护东帝汶人民的权利和根据国际法并在充分尊重东帝汶人民合法权利的情况下结束该领土的非殖民化进程,葡萄牙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具体目的。因此,我们依然致力于在秘书长主持下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积极会谈,以找到公正、全面和国际上接受的解决办法。

毫无疑问,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进展缓慢,在问题的实质内容方面我们没有取得进展。但是,看一下秘书长的进展报告——我在这里要向他表示感谢——就会发现,已经通过采取所谓的建立信任措施,并在东帝汶人自己参与谋求解决他们是主要有关方面的问题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步骤。

东帝汶最近不再是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领土。我们真诚希望对这个问题的日益关注将决定性地推动改善东帝汶人民的具体情况,并在承认和维护他们不可剥夺的合法权利方面采取一致的态度。

《海洋法公约》将于11月16日生效,从而使一个长期的重要进程达到高潮,这一进程将开辟采取行动以及开展合作的新的决定性渠道。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将清楚证明,大会应该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关于宣布1998年为国际海洋年的决议草案。我们相信,这项宣布将有效促进有关我们在这个领域所面临的问题的重要性开展更加广泛的辩论,并进一步引导世界公众舆论,从而达成一些解决办法,使这些问题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解决。葡萄牙积极参加了这一辩论,并谋求通过举行1998年里斯本博览会来实现我们确定的各种目标提供一个重要的手段。1998年的里斯本博览会将是二十世纪最后一次伟大的博览会,其主题与这个领域直接相关。

最后,我要谈谈本组织的体制改革问题。为了使联合国能够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和它的各种挑战以及开展全球合作的更大的可能性,非常有必要进行这些改革。我们认为这些改革是必不可少和紧迫的,改革的进行应该具有透明度,并且以协商一致为基础。它们必须是切合实际的,并且应该以提高效率为目标。

尽管我们仍然处在起步阶段,我们认为在这里谈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目的是有用的。首先,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高安全理事会的效率并强化它的责任。我们认为,不应该在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之外再增添第三类理事国。确保提高安理会的代表性的注重实效的合理解决办法将是在每个区域增加一个非常任理事国。我们还认为,应该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数目,但是这一增加不应影响到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我们鼓励达成区域协定,进行更多的轮流,使得安理会获得更大的代表性。重要的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当具备充分承担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这一地位所带来的责任的能力和意愿。

一些国家已经宣布准备在实现《宪章》目标方面承担更大责任。葡萄牙政府今天在此宣布,我国支持德国和日本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统一后的德国为欧洲联盟的建立提供了明显的动力,日本是亚太区域的一个伟大国家,这两国都能够对提高安全理事会的威信和效率作出有效贡献。然而,如果增加常任理事国数量时不考虑也包括我们星球南半球的国家是难以理解的。在此方面,在合格的国家之中,我们自然提到巴西,它是联合国的一个创始会员,是拉丁美洲最大

的国家,该国坚定不移地遵守《宪章》的原则。

葡萄牙是1997年开始的两年期的安全理事会席位的候选人。我们的候选资格反映了对《宪章》所指出的联合国各主要目标的深切承诺。它也反映我们要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作出充分的贡献的意愿。

因此,葡萄牙重申其对联合国目标的承诺,我国作为本组织不同领域,特别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积极参与者,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以支持联合国的目标。

我们正在迎接《联合国宪章》的五十周年。葡萄牙将设法强调这一纪念活动,并保证广大公众,尤其是年轻人了解其重要意义。

在这次庆祝活动中,我们希望对更新我们的理想和触发人民的良知作出贡献,以便促进人们更多地参与实现《联合国宪章》规定的目标。

简而言之,这意味着进一步提高对联合国解决人类在本世纪末时面临的重大问题方面的不可取代的作用的认识。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塞内加尔和居住海外的塞内加尔人国务部长和外交部长发言。

尼亚斯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国际社会再次召开会议,其不同的会员国欢聚一堂,以审议世界状况,并为今后12个月的前进道路指明方向。

我们感谢上帝给在座各代表团的启发,使它们选择姐妹和友好的科特迪瓦共和国外交部长阿马拉·埃西先生阁下担任大会本届会议主席。他的当选既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对他的国家的赞扬,因为世界承认并认识到科特迪瓦对有关和平的所有方面以及人民间的谅解的巨大贡献。该国这样做应归功于已故总统乌弗埃-博瓦尼的远见,他的杰出的继任者、亨利·科南·贝迪埃总统继续遵循他的远见。

他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我个人感到高兴和骄傲,我国整个代表团和塞内加尔也有同感,因为自古以来,我国同科特迪瓦便有着许多友好合作关系。因此,塞内加尔同科特迪瓦一样热忱地欢迎和欢呼国际社会对他的才干的赞赏。主席可以指望塞内加尔代表团的支持以促进他的任务取得成功。我们今天向他表示热烈祝贺,我们对看到他主持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感到同样的骄傲。

我们向他的前任、圭亚那常驻代表塞缪尔·因萨纳利大使表示敬意,赞扬他指导大会第四十八届会议工作的技巧

和权威。

我也谨再次向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继续在执行本组织首脑的出色任务时所表现的精力和献身精神,在日益困难的全球形势下,他以同样的效率执行这一任务。

最后,请允许我感谢各代表团一致决定选举塞内加尔常驻联合国代表、我们最出色的外交官之一凯巴·比兰·西塞先生担任第三委员会主席。这样做就把这一任务委托给塞内加尔了,塞内加尔对人权和该重要委员会职权范围内的其他领域的献身精神是众所周知的。西塞先生和我们大家都想要同在座其他国家一道完全致力于确保第三委员会的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如果说世界历史中有些年头是不能忽视的,刚刚过去的12个月无疑就是这样的年头。这一年中充满了具有伟大政治意义的事件,其特征是南非局势的积极发展,种族隔离的结束,就在几个月前,一个民主国家诞生了。这一阶段中阿拉伯-以色列关系中也出现了政治和心理上的起伏。在此方面,我们满意地看到南非现在已经在国际大家庭中占有其合法位置。

真理终将胜利。出于这一不可避免的现实的名义——这就是正义事业最终目标的象征——自从1993年9月13日华盛顿《原则宣言》发表以来,中东长期的问题——其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取得了进展,其标志是长期以来分裂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的心理之墙的重要支助的持续倒塌。

因此,在曾经作为圣经宗教的崇高精神信息的区域,这种事态发展现在使人们有理由希望最终看到在以色列人同巴勒斯坦人之间、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永久共处的空间,真正尊重整个区域的人民和国家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它们使人们有理由希望看到在这些国家和人民之间在各种可能水平上进行合作,以共同管理其重要的支助系统。

在提及这些希望的同时,我们对所有那些参与这项积极发展的人表示敬意是恰当的,他们的努力为中东的冲突打开这一新的机会之窗创造了可能性,这尤其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领导人;由于他们的政治勇气和历史使命感,他们最终同意踏上了在中东实现公正与持久和平的道路。

塞内加尔再次向亚西尔·阿拉法特主席阁下表示支持和赞赏,他有勇气和政治远见使他牢牢地握住他于1974年在此

处所谈到的橄榄枝;我愿代表塞内加尔表示希望,在他为以色列-阿拉伯冲突实现全面解决采取必要的额外步骤的同时,该问题的所有其他方面能够在当前事态发展的积极倾向中得到处理,并且根据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达成一项解决方案。

我们还由衷地向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先生阁下和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先生表示祝贺和鼓励,他们为实现中东危机的解决作出了持续努力。此种努力必须继续下去,得到加强和鼓励。

然而,虽然过去的一年以这些积极和历史性事件为标志,但却也使人产生关注和偶而出现失望。的确,尽管我们不断地付出努力,一些冲突仍继续存在并有时甚至陷入我们曾希望再也不会目睹到的恐怖情形当中。

从安哥拉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从利比里亚到索马里和最近的卢旺达,我们接受到了回声和图象并目睹了长期危机局面的令人感到震惊的恐怖,从而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继续顽强地谋求对话和协调行动,以找到持久性解决方案;这种方案的基础应是平等、正义、法律、以及最终在人类大家庭中和平生存的不可动摇地的信念。

在当今非洲大陆的冲突局面当中,必须实施预防、管理和解决非洲冲突的机制,这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其方法是通过对各派之间已经签署的各种和平协定的尊重;但可悲的是,这些派系仍继续在杀害对方。我们非洲大陆必须永远致力于值得进行的唯一一场战斗,即争取民主发展和促进人权的战斗。

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已经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并且是以一种一贯和勇敢的方式这样做。它今天需要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支持。

安哥拉问题必须在联合国赞助下本着卢萨卡谈判的精神得到和平和最后解决。我们在赞扬罗安达当局作出的值得称赞的努力之后必须向安盟发出另一项强烈和具体的呼吁,以使和平最终在安哥拉实现。

关于索马里和卢旺达问题,我谨回顾有些涉及塞内加尔在这些人人所关注的问题方面所持立场的具体事实。

在索马里,国际社会长期以来所谋求的和平显然只有通过一项全面的政治解决才能够实现。这一解决方案应处理这场兄弟之间冲突的所有方面。此外,由于当时担任非统组



织主席的阿卜杜·迪乌夫总统阁下对这一问题一开始就十分了解,因此当他在1992年以伊斯兰会议组织第六次首脑会议主席在这一讲台发言时便提出了召开一个专门讨论索马里问题的国际会议的想法。大会当时对塞内加尔国家元首的这一呼吁作出了反应,通过了一项反映该内容的决议,至今仍然具有高度相关性。鉴于在今天看来很有可能出现另一次悲剧性转折的索马里问题的持续存在,似乎对这项积极倡导加以重新审议的时机已经到来。

在卢旺达,一场几乎前所未有的人类悲剧在4月份事件之后发生。在此方面,我愿指出,我国从1992年以来一直积极参与寻求解决这一冲突的努力。实际上,当时任非统组织主席的阿卜杜·迪乌夫总统主持了当时的为时较长的谈判,谈判产生了《阿鲁沙协议》。此外,塞内加尔国民军的官员还参加了被委以监督停火的非统组织中立军事观察员小组;我们知道,该小组在《阿鲁沙协议》签署之后便被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联卢援助团)所取代,塞内加尔曾经并继续参加该使团的任务。

这样,安全理事会在面对不能允许的对平民的继续的屠杀的情况下于今年6月22日通过了第929(1994)号决议,这当然是顺理成章的,该决议成立一支为人道主义目的的多国部队,塞内加尔决定参加这一部队。

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我们毋须回顾,它是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国际社会致力于其领土完整和主权。确认侵略者后解决的冲突全部责任落在聚集在这里的国际社会的肩上。

然而,似乎波斯尼亚塞族人实际有权公然和持续地蔑视国际社会所表达的意愿。对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人员的攻击、反复闯入安全区域和拒绝西方五国接触小组提出的最新和平方案都是一种进行对峙的模式的一部分,国际社会必须加以坚定、果断和最后的处理。

在此方面,我们认为,鉴于那里局势的恶化,安全理事会于1994年9月23日通过的关于取消对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经济制裁的第943(1994)号决议,不仅是不成熟的,而且是不合时宜的。

我们认为,这里的大多数会员国也有同感,即制裁如果不得到加强的话应至少得到维持,直至有利条件得到确立,这也就是说,建立对塞尔维亚和黑山与波斯尼亚塞族人所占领土

之间的边界进行监督的有效国际机制,解除对萨拉热窝的围困;波斯尼亚塞族人对实现危机的全面政治解决基于合作的真诚承诺;以及对波斯尼亚的政府来讲取消安全理事会第713(1991)号决议所施行的武器禁运,以便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精神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恢复行使其自卫的手段。

国际社会致力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重建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国今天正受到公然入侵的蹂躏。

我们认为,这些措施是我们理应期望国际社会所做的最起码的,以便为目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所进行的和平进程给予可信性。塞内加尔—其国家元首也是目前伊斯兰会议组织主席—在这一微妙问题上将继续在国际法范围内采取行动,以便确保终于实现彼此和解的波斯尼亚人民能够体尝到建立在其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平等权利和义务基础之上的持久和平。

今天的经济问题如此严重,以致已经产生世界安全的新概念。的确,当今生活的不安全感更经常的是来源日常生活的不断变化,而不是对全球性浩劫的任何恐惧。这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于人类发展的本年度报告所得出的结论。

就业保障、健康保障和环境保障是全球安全问题今天呈现的形势。这一发展自然提出了确定一项新“社会契约”的问题,必须进一步优先考虑人类团结—人类社会之间的团结,这表明了塞内加尔非常重视今年3月将在哥本哈根举行的社会发展首脑会议。那时我们必须变革我们的思想,更好的突出在更加强大的国际团结基础之上的人类发展方面的问题。

正是本着这一精神,塞内加尔国家元首于1992年9月30日在此向国际社会提出缔结一项普遍团结协议—关于团结的君子协定。具有积极意义的是,这一建议基本上列入了联合国秘书长的发展纲要议程,该议程旨在促进考虑到人类各方面条件的真正发展。

塞内加尔出于同样原因热烈欢迎正在进行的联合国机构的改革,特别是负责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机构的改革。

我们赞成“贸易,非援助”的方案,这经常用来表明全球贸易是经济发展的真正推动力,其作用大于发展援助。有益的是,126个国家的代表按照这些方法于今年4月15日在摩洛哥王国的马拉喀什签署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贸易组织)

的协议。

我们希望贸易组织的诞生标志着半个世纪以前布雷顿森林所构想的结构之终结,因为国际贸易已提高到与货币政策和金融促进发展相同地位。因此,《马拉喀什最后协定》成为联合行动、磋商和团结的新推动力,这将最终促进建立更加公正和平衡的制度来管理贸易。

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必须结合发展中国家的集团的特殊需要和问题,例如更加公正的确定和利用管理国际贸易的新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移民政策、专业培训、创造就业机会以及技术的转让来满足南方国家的需要和愿望。

在这方面,我必须提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即1994年6月18日在巴黎通过的《关于在发生严重干旱和(或)沙漠化的国家特别是在非洲防沙制沙的国际公约》。在座的许多人代表了那些国家。

这是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所产生的一项重大建议付诸行动的结果。我们非洲大陆是该公约的发起者。必然会欢迎缔结这一多边法律文书,因为它承认存在着这一令人忧虑的环境问题。

如其他同类公约一样,应该向该公约提供充分的资金以使其能够制止和扭转沙漠化进程——它对非洲大陆来说是一种真正的灾难。

过去几年,在世界舞台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使联合国面临着新的挑战和使命。例如,在尊重《旧金山宪章》的基石国家主权原则的同时,本组织怎样才能处理认同要求、国内困难和内战?

当个人和群体象在前南斯拉夫、安哥拉、索马里和卢旺达冲突中发生的情况那样犯下了各种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罪行时,本组织能够而且必须以什么方式作出反应?可以建立什么障碍对付恐怖主义和内战以便处理危害和平的因素——分离国家实体的问题?在这些艰难的领域,本组织必须象在其他领域一样表现出具有创新和适应的能力。

处理前南斯拉夫战争罪行的国际法庭的设立、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计划,去年开始的关于改革安全理事会和更好的执行《宪章》第8章的审议都表明联合国坚定的致力于这一方向。

特别是关于安全理事会,进行所设想的改革应根据世界的新现实同时考虑到该机构职能的有效性和实际代表性。

过去几年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实质上体现了各国人民怀着人类团结的精神向往自由、正义和发展的根本愿望。要使这种变化持续下去,他们在国家一级刮起的民主化之风就需要在国际一级采取平行的行动。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必须确保各国平等参与确立新的准则,这能赋予国际生活更为牢固的基础并给大家更好的保障。建立这种安全,只能基于对指导我们一起促进更加美好的世界未来和人类解放原则的共同信念。

因此,在庆祝本组织成立50周年成立前夕,让我们本着友谊和团结的精神携起手来采取行动,以便使新时代放射出正义、和平和团结的光芒,留给后代一个和平正义和友谊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和贸易部长唐纳德·查尔斯·麦金农先生阁下发言。

麦金农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祝贺科特迪瓦的阿马拉·埃西先生当之无愧地被选为四十九届大会的主席,并向他转达我们的良好祝愿,祝他工作成功。

一般性辩论是我们会员国的机会,大家一起对本组织的工作——即其成就和失误——进行年度审查,并共同确定我们要求集中解决的问题。明年是50周年纪念日,因此迫切需要这样做。那将是我们为21世纪制定新的优先事项的时刻。

我们对当今的一些挑战和悲剧作出了反应,有的很出色,但经常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导;有的令人遗憾的不够,因而报道时遭到了藐视。

世界各国人民希望信任联合国以及它应实现的目标。然而,如果我们在本组织的一些机构中失去了目标和意图,这一金色的纪念日就可能出乎我们许多人的意料——不够欢欣鼓舞,却较沉闷。

副主席西索瓦·西里拉亲王(柬埔寨)主持会议。

和大多数小国一样,新西兰与联合国的成功利益攸关。新西兰人民一贯信赖联合国,把它作为一种解决全球和区域问题的集体方式。我国各届政府对联合国的有力支持表明了这一点。

根据我们在充满动荡的两年中——我毫不迟疑地指出这一点——担任安全理事会成员的经验,并作为本组织的一个作出坚定承诺的创始会员国,我想借此机会就我们作为集体决策过程中的一员所看到的问题发表一些看法。

当新西兰参加创立联合国的时候,我们和许多其他国家认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集体安全制度。不久前,这还仅仅不过是一种设想。随着两个超级大国集团之间对峙的结束,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三代人之前雄辩地提出的“有组织的共同和平”目标出现了。我们这次一定不能让它从我们的手中溜掉。然而,达到这个目标,必须真努力和真有决心。

集体安全,或共同努力,是小国安全的柱石。今天,小国在本组织的会员国中占着绝大多数。新西兰人意识到,和平不可分割的,地处偏远肯定决不是保障:世界上任何地区的问题都会波及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尽管我们可能是最远离巴尔干冲突的国家,但我们仍派遣了一个加强连的士兵去帮助进行减轻苦难的努力,我真诚地希望,这种努力随着有关各方的意愿将终有一天在整个前南斯拉夫境内实现和平。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国国防人员参加了非洲、中东、亚洲和最近海地的支持和平的行动。新西兰的护士、消防人员和救济工作人员正遍布全球,提供各种支持。

然而,在这个背景下,联合国执行其某些重要任务的方式有时使新西兰人感到困惑。在波斯尼亚,尽管所使用的部队以任何标准衡量都是庞大、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人们仍然每晚都在其电视屏幕上看到小型的非正规军组织、单单一个警察或甚至一小群非战斗人员给联合国保护部队带来挫折。在海地,他们看到满满一船的兰色贝雷帽被一小群不能令人信服的称为“随员”的挥舞着手枪的流氓赶走。

关于卢旺达国内的令人震惊的悲剧,人们又能说些什么呢?怎么能够如此恶毒地释放出如此多仇恨,使数十万人被杀害?我们原来认为,我们恐怖地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的破坏规模只有百万吨级的炸弹才做得到。仅仅因为其种族出身而被系统地屠杀的男子、妇女和儿童使我们大家都感到愤慨。

简单的答案是没有的。但是,打开真正的集体安全的可能性的第一把钥匙必须是正确适用《联合国宪章》。我们必须决定,联合国应该在什么样的具体关头参与缔造和平的行动。我们是不是看出了问题,如果我们看出的话,是不是正在发生我们如此坚信的预防性外交?

我认为,我们必须照《宪章》的意图去作。第一,在一场危机开始的时候,或甚至在看到危机迹象的时候,我们必须通过预防性外交进行更为严肃的努力,以便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和冲突。必须在早期阶段进行努力,通过由安全理事会行使《宪章》第六章为其规定的所有责任,来解决冲突的根源。

然而,在现在这个现代化大众通讯技术的时代,我们有时面临着公众认为正在发生的事情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所带来的困境。广泛的新闻报道带来立即作出反应的压力。在卢旺达,这种反应是适当的。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新闻媒介把问题过份简单化,忽视了实地情况非常混乱,联合国的资源捉襟见肘的事实。

第二个可以更为小心地使用《宪章》的领域是争端被第一次提呈安全理事会处理的时候。我认为安理会在举行非公开会议处理问题的时候,应当充分听取受影响国家的意见。我们关于安全理事会的经验显示,通过建立一种集体直接听取有关各方意见的做法,即使只是非正式地听取,以增加公开性是值得的。

在同一方面,《宪章》特别规定,提供部队的国家可以在没有表决权的情况下参与重大的决定。新西兰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迄今成功有限。事实上,如果安全理事会不对已经提出的关注做出适当的反应,大会很快将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

根据《宪章》,人们对安理会各常任理事国抱有很大的期望。毫无疑问,它们可以而且确实为联合国的工作作出很大贡献。例如,三年半之前,各大国的领导作用和作出的牺牲在成功地反对对小国科威特的侵略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然而,我再次强调安全理事会决策过程的集体性质的重要性。把“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其他国家的观点加以区别实际上不是健康的做法。安全理事会是一个由15个国家组成的集体。它必须在一起进行工作。我的意思是,应该充分考虑所有安理会成员的观点。新成员在1月1日带来的生机勃勃的热情每年都使安全理事会的力量得到增强,并考验着这个原来可能变成一个被公认的第二流的机构。

我想提醒大会,《宪章》明确规定,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行动的准则将是联合国的行动。当然,并排除国家一级的行动。因此,我想着重指出并提出疑问的是,最近朝着在国家指挥下的联合部队发展的趋势及其对不涉及战略意义边远小国集体安全需要的影响。

然而,评判安全理事会要看其效力。希望成功将多于失

败,但我们所有人都有义务提高成功率。我是一个提高我们成功率的热忱支持者,但其中很多工作要处理问题的方式来落实。而我希望讨论的正是处理问题方式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经验,关键在于采用已经过证实的现代私营和私营部门经验为基础的管理工具。这是非常宝贵的。这些工具是什么呢?我们如何能够把它们适用于进行维持和平行动。

我提出,有六个关键的组成部分:第一,可持久的财政制度;第二,透明的政治负责制度;第三,规定进行定期审查的明确目标;第四,清楚、明确的指挥和控制结构;第五,保证联合国人员安全的可信的法律制度;第六,可以得到资源,以便能够迅速和有效地达到目标。

现在让我回过头来谈第一点,即可持续的财务制度。毫无疑问,本组织正在面临一种不容忽视的财务危机。我们已经遇到严重的储备问题,而且对各捐助国欠下了很大的债。最大的捐助国已经表示它将从明年十月开始单方面减少它的资助份额。这一局势是不能持续下去的。需要采取紧急行动。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危机?有一些简单的答案。有些会员国无法交款,另一些不愿意交款,而有一些则在对他们分摊的款项是否合理进行争论。大会必须面对这一问题。联合国必须停止对不交缴会费的国家延长他们的欠款期。正在出现足够的迹象表明,在目前的体制中可能有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有些在过去五年到十年期间经济成长特别强劲的国家在会费委员会公布的订正分摊表中的交款数额与前持平甚至有所下降。这是不能接受的。这必须加以纠正。

我们不想在本组织面临财务危机的情况下来空洞地庆祝五十周年。我们必须在第四十九届会议结束之前作出承诺来解决这一危机。

第二点是政治责任制的必要性。我认为,发展和提高本组织负起其集体安全责任的能力同等重要。为此我们需要在本组织整个范围内制订更为透明的程序。维持和平行动的管理工作分配给了秘书处。这是必要的,也是适当的,就象任何政府把一项复杂的行动的责任授权给它的公务部门承担一样。

但是,我是以一个政治家也是以负责处理和监督政府各部门的部长身份讲这番话的,一个公务部门官员在没有认真

的政治监督情况下可以管理一个部门或进行一项重大的行动,那样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并不是要宣传微观管理,我也并不是在暗示对秘书处工作人员的批评。但正如当今民主社会中负责行政事务的政治家所知道的那样,解决一个失败的项目的典型的办法是,使那些在政治上要对其负责的人失去执行的路线或失去行动计划。

这一点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中在索马里看得太清楚了。富有讽刺意义的是,安全理事会已经在第814(1993)号决议中预见在联合国索马里行动(联索行动II)中有必要建立详细的政治负责制,并规定要设立一个委员会密切注视该行动。但委员会却始终没有设立。

新西兰曾经在安全理事会建议应该设立一个委员会或特派工作小组来填补这一空缺并提高本组织对它在政治上负责的代表负责的能力。我肯定依然希望在这方面可以取得进展。

我要提请各成员注意的第三点是在经常性审议中需要有明确的目标。必须确定更为明确的任务目标,并经常予以审查。我高兴地看到,事实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安理会现在正在更加仔细地确定联合国各项行动的任务期限,并且在任务中规定具体审查周期已成常规。但还有两方面的弱点。

第一,联合国行动应使用武力的条件仍颇具神秘,且合理的分析甚少。许多人认为这是由使用或不使用“第七章”这几词所决定的。这可能是十分错误的决定。更有可能决定实际的实际行动的是介入规则而不是抽象地提及《宪章》。

不只我一个人认为,应该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发展更为共同的军事原则。在如此多的提供维持和平部队的国家通常肩并肩地部署在实地时,这一点就有着特别重大意义。但是,本组织要克服的挑战是各派别而不一定是政府使用武力,面临这种国内型新行动情况就特别紧迫。

显然,必须有共同的原则来指导维持和平人员在根据一致同意的联合国战略目标而参加行动时适当地使用武力。至于审议问题,尽管有许多中期审议,但是还没有在行动结束时进行审议的制度化程序。每一次维持和平行动的预算应该包括一项主要的规定,即拨款根据所定任务全面审查行动的成绩。

这种审查应该与财务状况的审查分开进行,而且应该审查行动的实质性问题并努力为今后行动的进行指出有意义的经验。

现在我要谈谈指挥和控制的问题。在指挥和控制结构方面有一个弱点,的确值得我们注意。诚然,向联合国提供部队的各国国防部队人员从法律上来讲仍然是在其本国的军队中服役。但我认为,在向联合国部队指挥员分配职责的同时,必须认识到国家指挥结构将不会力图在行动事务方面指挥他们的部队。如果国家指挥权威遇到了严重的困难,那么在所有情况下——除了紧急情况之外——应该采取的合适的行动是由联合国总部来解决这一问题。如果问题无法解决,该部队就应该撤出。

现在我谈谈维持和平人员的安全问题。对有效地集体安全的一个重大的要求是提供部队和文职人员的国家应有信心,知道他们的实地人员将会得到尽可能好的支援来确保他们的安全。许多成员都知道,这就是新西兰作为安理会成员时一直坚持的问题。它关系到部队所配备的装备水平,而且有着很大的改善余地。

此外,进行维持和平行动所依据的法律体制必须反映联合国人员在代表我们所有国家进行集体安全行动过程中正在遭受的特别严重的个人风险。的确,这些人员应该不同于武装冲突中的士兵,而且对向他们进攻的任何人应该按更高的法律责任标准处置。我促请大会所有会员国支持新西兰对目前正在第六委员会审议的这一问题所提出的倡议,即对悬而未决的问题采取必要的灵活性,而且我们还应该作出真正坚定的努力在今年完成公约草案的工作。

资源问题是一直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在我的第六点中我要谈到有效的集体安全的关键工具是获得资源的战略。我们大家近来在卢旺达所见到的局势是一种典型的情况。人力资源有,但是他们缺乏训练,也缺乏装备。但是在所有维持和平行动中需要有一种在自卫中作出有力反应的能力。从今年四月在卢旺达部队遇到伤亡事件中应该取得重要的教训,因此我再一次提请注意任务、介入规则原则和计划之间的联系。

联合国必须在目前对备用部队正在进行的工作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以便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有理由把大量双边军援调用于训练,这种训练将帮助防务部队更好地达到维

持和平行动的要求。

联合国现在在财政方面也所应起作用,保持维持和平储备金的实际水平。迅速启动能力,联合国能立即得到各国拥有或出租的装备,本来会使卢旺达的局势大不相同。这是确保未来集体安全在实际上可迎接挑战的切实可行的步骤。

我已经谈过有关管理维持和平行动应考虑到的因素。下面我想谈一下它们的活动的条件。

不应期望联合国对长达30年的局势负责任,因为冲突的有关各方不能也不愿唤起实现解决所必须的政治意愿。到了一定时间,各有关方面必须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由安理会通过延长任务期限回避作出困难的决定。

同时,联合国在即将成功地完成一个维持和平行动时应考虑到一系列事项。在实现了一个预想目标后——如选举——,联合国不能一走了事。因为可能还存在需要对行动继续支持的尚未解决的问题,如人道主义行动或协助建立所需的健全管理的当地能力开发方案。

例如应该对联合国在柬埔寨的成就表示祝贺。但是那里的前途尚不明确,联合国必须保持其责任。那个国家重建必须继续下去。

必须把建立和平和缔造和平看作为一个整体的情况的另一个例子是除雷领域。这项工作具有重大人道主义作用。新西兰的军事部队帮助联合国在阿富汗、柬埔寨以及最近在莫桑比克扫雷,积累了许多经验。

约两个月前访问了莫桑比克的安全理事会特派团通报其对方案的延误和一般情况的沮丧。根据联合国的要求,新西兰在8月初插手并开始拯救方案的努力。本来没有必要再重新发明轮子。令人不安的是,从过去如阿富汗和柬埔寨的行动中得到的教训似乎没有记住。在柬埔寨亲眼看到布雷后果之后,我认为我们应以超过目前行动的速度更迅速地采取行动。

新西兰当然盼望与其他代表团共同努力提高这方面的工作水平,我谨当然地补充,我国政府对克林顿总统昨天在这里提出的关于清除世界8 500万反人员地雷的建议十分感兴趣。这是一项紧迫任务。任何亲眼看到过地雷对人的杀伤情况的人都不会不为此目的进行充分合作。

最后,我们展望如何真正加强集体安全权力的适当使用时,我们必然得出改革安全理事会是有待完成的重要任务的

结论。今天我所谈到的许多事项都要求安全理事会的改革,或至少是同它有关联的。但是我不得不得出结论,即使所有这一切都实现了,安全理事会的政治合法性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仍可能削弱。最终它会丧失发挥作用所至关重要的可信性。

集体安全要求安全理事会真正代表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当然我们象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关注去年成立的不限成员的工作小组对安全理事会改革的辩论。我们听到关于增加常任理事国的解释。我们还知道对增加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广泛支持。关于理事国总数有各种不同看法,但在增加五或六个新理事国上似乎已形成协商一致意见。我们认为有限地增加理事国并注意地区的平等参与仍然是健全本组织的首要问题。现在可以作可实现和有益于大多数会员国的事。因为需要122个会员国的批准,我们知道即使明年能按希望通过关于简单地扩大安全理事会一事,也要几年后生效。因此,在2000年看到扩大的安全理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不会是不现实的。

如不象我一样认为问题可以解决,批评联合国的某些方面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所有184国是它的医生,我们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动。我们需要公平和有系统地分担费用,接受本组织的民主决定,并且适应联合国将来更复杂和相互关联的议程。

因此,我向大会保证,新西兰重申对这个独特和重要组织的承诺,并以此精神努力确保今后五十年内对联合国继续尊重的意愿。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外交与合作部长穆罕默德·萨利姆·乌尔德·勒克哈勒先生发言。

乌尔德·勒克哈勒先生(毛里塔尼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贺你理所当然地当选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主席。

我们深信,你的杰出技巧和广泛经验将保证本届大会圆满成功。贵国,姐妹般的科特迪瓦共和国,在谋求非洲以及全世界和平方面一直发挥着有效和缓和作用。

我还谨向你的前任圭亚那的塞缪尔·英萨纳利大使表示最衷心的祝贺,祝贺他干练和技巧地主持了上届大会的工作。

我还谨代表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向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的不懈努力表示敬意和支持,他的努力旨在使本组织实现其目标。

在本届大会召开之际,国际社会面临无数挑战,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穷国与富国之间差距日益扩大,紧张局势的温床增加。此外,穷国众多的人民受到越来越沉重债务负担的压迫,使这些国家人民的社会经济发展前景暗淡。

我们今天所目睹的是蹂躏所有这些国家的血腥冲突及其相伴而生的苦难和各种形式的破坏,而不是人们所希望的繁荣。这种邪恶的事态发展不仅破坏了这些国家人民得来不易的所有成就,而且还给他们造成新的一类苦难,并使他们失去本来在享受尊严、稳定和进步生活时可以抱有的任何希望。

国际经济形势仍在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它们都感到了结构调整方案的消极影响,这些方案都把焦点集中在宏观经济平衡上,并对这种调整的社会代价显然漠不关心。

应该强调,在1980-1989年期间实行这些方案的55个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改善了它们的经济形势。在这10年期间,29个国家出现了人均收入下降的趋势,13个国家中的社会条件实际恶化了。

尽管0.7%的目标本应促进创造更好的条件,政府发展援助停滞并有所减少也使这些危机因素更加复杂。

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形势的恶化其性质很可能对执行各项国际公约和方案,特别是有关环境的公约和方案、儿童行动方案以及促进和保护人权行动方案产生消极影响。而且,这种恶化将对目前其他谈判的成功机会产生不利影响,这些谈判的目标都旨在解决危及整个人类繁荣的各种问题。

实际上,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太多,无法一一列举。不幸的是,妇女、儿童和穷人等最易受害的社会群体在这种局面中完全首当其冲。如果在我们的时代失业和高犯罪率成为普遍现象,则资源有限的国家就很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多地受其影响。因此,现在越来越紧迫地需要制定预防性办法,使其有可能正视这些社会弊病。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即将在哥本哈根召开的世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我们希望这次首脑会议将导致各项主动行动,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其发展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发展是世界和平的真正保障,我们地球上绝大多数居民

悲惨的生活条件使我们世界无法实现和平与稳定,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

因此,我们对秘书长提出的发展议程寄予很大希望。这份文件应该得到我们的赞赏,并应获得广泛支持,以便使它成为促进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真正工具。

世界经济形势的脆弱性不应掩盖国际关系一些领域取得的成功。

在这方面,我们欢迎秘书长为解决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章给某些国家造成的问题所进行的磋商取得成功,该公约将于1994年11月16日生效,这标志着其演进过程中一个决定性阶段的开始。

我国认为,联合国跨界渔类和高度洄游鱼类会议应该导致严格的全球解决办法,制止掠夺渔类资源,并结束目前在海洋上普遍存在的无政府状态。

毛里求斯伊斯兰共和国同受沙漠化现象威胁的其他国家一起为缔结一项旨在特别同非洲的旱灾和沙漠化作斗争的世界性公约作出了重大努力。在我们对这些谈判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的同时,我们表示希望该公约将成为国际社会为这些受旱最严重的国家采取积极行动的开始。

由于联合国的各项努力而取得的所有成果突出表明了人们赋予联合国的重要核心作用并证明其普遍性。

但毫无疑问,现在有必要对联合国的体制和程序进行改革。为重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已经作出的各项决定如不同时拨给使其可以执行各项发展方案的资源,就不过是一纸空文。

我们应该永远铭记,所有冲突和由此产生的动员庞大财政资源的维持和平行动都是造成有关国家经济和社会条件恶化的主要根源。

对我们地球和各紧张地区所作的迅速考察足以证明,不发达及其造成的各种问题只是在给这些紧张局势火上加油。

民主和人权领域中的进展无疑是国际社会最近取得的最重要进展。

我们在赞扬这两个领域取得的进展时,绝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能把民主局限在各国的国家构架内,民主还应包括各国之间的国际关系。

为此,我们支持通过增加安全理事会成员扩大其代表性的各项努力。我们希望,这种改革将依照民主透明度的原则

进行。

我们认为,无论安全理事会新结构可能采用何种方式,都有必要遵守各会员国平等的原则,并尊重这样一个事实,即根据《宪章》第24条,安全理事会代表各会员国行事,因此必须反映整个国际社会的观点和愿望。

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1986年通过建立民主体制和1992年组织总统和议会选举,发动了民主进程,市政厅和参议院三分之一席位的选举使这一进程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在代表各思潮的几个政党竞选后,这些选举已得到选民的广泛参加,并由独立的国内新闻界作了广泛报道。

因此,毛里塔尼亚人民正在日益巩固其年轻民主的基础,用共和国总统马维亚·乌尔德·西德·艾哈迈德·塔亚先生阁下的话说,这种民主就是“所有主权与法统”的主要动力。

毛里塔尼亚人民正是在这种民主环境下对经济和社会不发达的各个方面进行坚决斗争的。

我们应该强调我国通过1984年实行一系列经济改革所取得的重要收获以及所有毛里塔尼亚公民现在享有的政治稳定、自由、正义和平等。

我们还要表示,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对自己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犯的发展中国家感到自豪,而且同重视法制的国家,例如有长期民主传统的国家所感到自豪的一样,我国也已实现新闻自由、多党制度和工会自由。

谋求和平将继续成为我们的主要关切,以便使我们可以对付本世纪末的各种挑战。冷战的结束为出现一个正义与和平普遍存在的更美好世界开辟了新的前景。但是,需要组织维持和平行动的紧张温床的增多使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要防止类似我们过去目睹或现在正经历但无法制止或解决的人间悲剧重演,就必须有一种新的外交风格。

我国希望,中东最近的事态发展将是解决巴勒斯坦人民悲剧的开始,至少他们将能够行使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的合法权利。我们认为,给予加沙自治的1993年9月13日《原则宣言》--随后有1994年5月4日的开罗协定和最近1994年7月25日约旦的侯赛因国王陛下同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间的会谈--将开创一个新纪元。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希望,这一初步成功将导致以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和338(1973)号决议为基础的公正、全面和持久的和平。

联合国应当继续支持中东的和平努力,直到最终解决该区域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此方面,我们希望,捐助国在1993年10月1日会议上作出的承诺将变为具体的行动,这将重振巴勒斯坦的经济,并帮助解决其经济和社会问题。

在这敏感的地区,海湾战争的后果依然存在。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一向申明其对国际法制的坚定不移的支持,表明我国完全拒绝对兄弟的科威特的独立和领土完整或其公民的权力的任何侵犯,我国同样反对任何可能破坏伊拉克统一或领土完整的做法。现在是结束伊拉克人民痛苦的时候了。

在同一敏感地区,我国愿重申对兄弟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恢复其对大、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的合法权利的毫不动摇和彻底的支持。

关于阿拉伯马格里布,我们仍然希望,联合国将能够排除继续阻止撒哈拉问题的解决的障碍。我国将不遗余力地帮助本组织执行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我们的决心产生于我们要实现公正和持久的解决并加强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马格里布的进程的愿望。

我们也希望将取消对利比亚人民的禁运。我们意识到,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已具体地证明它准备同联合国和其他集团进行合作,并且禁运正在影响马格里布所有其他人民的利益。

关于非洲,我愿表示我国对联合国批准的维持和平行动感到满意,这些行动的目的是结束该大陆部分地区的流血冲突。在几周内导致50万人民死亡的卢旺达悲剧,是我们时代最恐怖的磨难之一。在此方面,我必须赞扬“绿宝石行动”的出色安排,这一行动是在规定时间内由法国领导和非常谨慎地执行的。该行动是适当和不偏袒的人道主义干预的典范。我国参加了这一崇高的人道主义行动,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使我们的卢旺达兄弟有机会一道努力寻求其问题的解决方法。我们希望这种国际努力将使那些兄弟能够治愈创伤,为实现民族团结和重建国家而努力。

不幸的是,卢旺达并不是非洲武装冲突造成自相残杀的冲突的唯一地方。在索马里、利比里亚和安哥拉,内战继续激烈地进行,尽管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为恢复和平与和谐,以取代兄弟之间的仇恨和战争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我们希望,这些国家的公民将听取理智的声音,并同意捍卫自己的利

益及其人民享有和平与安全的权利。只有通过负责和建设性的对话才能实现这项目标。经验表明,武力的语言无法导致有效的解决方法。

在莫桑比克,我们正特别关心地注意着预料将导致在1994年10月27日和28日举行选举的各项步骤。我们希望这些选举将体现于1992年10月缔结的和平协定的精神,并将能够在适当的和平与和谐的条件下进行。

非洲大陆面临的人类悲剧不应当使我们看不到已发生的积极的事件。例如在纳尔逊·曼德拉总统的领导下的南非民主的胜利和利比亚和乍得之间冲突的解决。我们向南非代表表示欢迎。他们的到会标志着所有非洲人民长达十年之久的斗争的最后胜利,这令人感到骄傲和高兴。

在所有人看来是民主和尊重人权的最肥沃土地的欧洲大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塞族对穆斯林赤裸裸的侵略是对人类良知的公然冒犯。在漫长的两年时间里国际社会的努力未能停止塞族的侵略,这种针对穆斯林的侵略显然具有“种族清洗”的形式。尚未作出军事努力,以结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居民的痛苦。他们继续在剥夺其自卫所需武器的禁运下受苦受难。实际上,联合国现在必须充分履行其《宪章》职责,利用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武装部队,按照《宪章》原则和本组织维持和平的责任结束这场可怕的悲剧。

在1995年,我们将庆祝本组织50周年。这一纪念活动应使我们能够总结半个世纪以来取得的进展,并制订处理未来问题的更好的计划和方案。同一年中将发生的另外两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将涉及寻求仍然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的解决方法: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和将在北京举行的第4次世界妇女会议。我们希望,这两次会议的结果将同旨在改革安全理事会的谈判结束结合在一起,以使本组织具备必要的结构,使其能够应付21世纪的挑战。

世界人民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把他们的所有希望寄托在联合国身上。本组织必须确保同时维持和平和促进发展合作。本组织这样做将体现人类对一个和平与稳定世界的愿望,并从而将成为各国协同努力迎接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的时代到来的一个真正的熔炉。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黎巴嫩外交部长法里斯·布维兹先生阁下发言。

布维兹先生(黎巴嫩)(以阿拉伯语发言):今天我们聚集



在这里,参加大会的一届新的会议,这是联合国生活中新的一年,在这一年联合国已存在了半个世纪,明年我们将庆祝联合国五十周年。

一个伟大的理想问世将近半个世纪,人类设想这一理想是一种争取和平、和解、团结、和睦、和各大陆各种不同种族民族和文化的人民间相互对话的事业,这是我们这一世界上各种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宗教和信仰之间的对话,尽管这个世界上有着各种差别和特点。

通过这一伟大理想,人类将要创造一个仲裁者,一个权利、正义与和平问题的裁判,一个人类可以讨论人类的问题和寻求仲裁的讲坛;在这一论坛中,人类将找到办法,在权利被剥夺时捍卫权利,在非正义得逞时捍卫人类,它将是人类受威胁时站在人类一边的旗手。

通过这一理想,人类想要结束战争和武装冲突,保护国家主权,保证尊重他们的独立和自由选择。

于是,联合国诞生了。

联合国诞生了,随着联合国的诞生,出现了一项伟大的工程——人们期望这一工程为解决世界的危机作出贡献。同联合国组织一起,建立起了联合国各种安全、社会、经济和文化机构。世界人民对这些机构给予很大的期望,并且也这样对待它们,给它们与它们的地位相称的尊重。

这一有威望的世界性机构的意愿代表着世界人民的立场、决定和意愿,它的意愿比任何一个国家的意愿更为全面,不论这一国家如何伟大和强大。世界人民尊重联合国,给联合国以通常给予权利和正义的捍卫者才能得到的尊重。权利和正义高于政治利益,不管这些政治利益怎么巨大。

今天,我们距离这一理想,距离这场伟大的努力,距离所有那些打算、口号、雄心、愿望、理想和前景有多远?

战祸四起,世界和平在那里?冲突愈演愈烈,我们为了解决冲突作了些什么?消灭暴力呢?暴力还在升级。今天,我们距离保护正义、捍卫仍在遭受破坏的国家主权、尊重仍在遭受践踏的人权和人民及国家权利有多远?

对于本组织就在这一大会厅中通过的各项决议,我们做了些什么?对那些仍然有待执行和其他许多流荡在无能为力和作交易的迷宫里等待通过的决议,情况又怎么样?今天,我们距离我们决议的信誉和权威有多远?距离用一个统一的标准衡量事物的目标有多远?

我请各位包涵我胆敢提出这些问题。我请各位包涵,因为提出这些问题的并不是有胆量责问联合国的大国俱乐部的一名成员。

我请各位包涵,因为需要联合国的不是那些强国和有权势的国家。联合国并不是为了它们创立的。联合国是为了受压迫,不公正待遇和决不算强大的国家建立的。

国家面积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从来就应该是衡量其作用和贡献的真正尺度。许多国家的历史比本国的地理更加伟大,他们的作用大于他们的面积,他们的贡献远远超出其他国家的潜力。黎巴嫩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我国已经存在数千年,自从人类首先组成实体时就存在。那时起,我们就有了我们的政治、文化、经济、法律和人道主义结构。

同黎巴嫩本身的腓尼基文化一起,黎巴嫩接受了法老文化、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化。我们最突出的贡献是首先创造了人类的字母。我们还用我们的法律、知识、文化、经济、科学、教育和人道主义方面的贡献,丰富了人类。

副主席洛佩斯·达罗萨先生(几内亚比绍)主持会议。

联合国诞生时我们在场。国际法院作出第一个裁决时,我们也在场,并对此作出了贡献。我们自愿在所有各级,在所有的联合国机构和方案中工作。我们承担了我们应该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为有些机构和方案提供东道主之便,并向他们提供了我国最优秀的人员和知识分子。

社会和文化的多元化是我们的民族的标志。根据我国人口的构成情况,我们发展了一套建立多文化民族国家的简略公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时期的建国原则以民族和宗教血统为基础。今天,在电讯高速公路的时代,在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的时代,我们已经认识到,这一原则经过试验,已经失败了。

以往,虽然也有某些政权企图消除在其统治下各种人民不同的特征,如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这些特征已经重新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因压制其特征所造成的各种问题。

如果说,鉴于黎巴嫩社会多元化的特点,它在过去几乎独一无二的话,今天已经不再如此。随着我们目睹现已司空见惯的居民人口变动以及地理政治障碍的瓦解,黎巴嫩经历已经到处可见。我们的公式已经过考验,而许多国家还处于

试验阶段。

随着民族主义理论的破灭,现在需要一种新的体制,这种体制将允许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特征在一个家园内共存,这也是现代经济、技术和实际的挑战和需要所决定的。

黎巴嫩,其土地和人民仍不得不遭受地区和国际冲突的蹂躏,遭受国际意识形态分歧及其并发症的飓风的残余影响。但是,象我们历史上一样,我们已证明有能力应付我们面临的挑战,我们的共存方案比有些人想象的更加强有力,这仅仅因为它是唯一可行和实际的方案。

当黎巴嫩以其人民的意志和其兄弟及朋友的支持为武器战胜了它国在其领土上发动的战争时,当黎巴嫩加强其国内安全与稳定、在其各派别和力量间重新开始全国对话并消除隔阂时,当黎巴嫩开始重建其机构、恢复其基础设施并开展政治经济活动时,它再一次证明,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它那么强大,不会被消灭的。

但是,只要其大片领土仍不受其控制,只要国家仍不能依靠其自己合法的国防军在其整个领土上行使充分主权,黎巴嫩对其所有领土的充分主权及其完全独立就仍然受到损害。

只要以色列不顾一再通过的联合国决议和国际社会的意愿占领黎巴嫩领土,只要黎巴嫩公民仍然在以色列拘留营里受苦,被国际社会忽视,得不到没有获准探望他们的人道主义组织的帮助,只要这一切继续下去,伤口就不会愈合,流血就不会停止。

只要对我国八分之一多的领土继续实施占领,只要以色列继续每天用炸弹、地雷和陷阱来袭击我们的国土,多半杀死我们的无辜儿童,只要继续对拒绝投降的英勇人民犯下这些罪恶行径,我们的妇女儿童的哭声,我们的愤怒、反抗和抵抗的呐喊声将继续在世界萦绕。

无论使用什么手段,占领迄今仍未能遏制这种愤怒。日复一日,死亡人数在增加,对我们对他们来说都这样。鲜血在黎巴嫩南部和贝卡谷流淌。任何独出心裁的技术发明,任何战争手段都不能动摇我国人民重新获得独立、自由、主权与和平的决心。

仍有300多名黎巴嫩男女在以色列监狱受苦。其中一些人已死去,还有一些人已致残。在他们的牢房里,他们听到一种叫做“人权”的理论,这种理论是我们会议和论坛议程上的首要项目。理论家们专注关心动植物及环境的权利,而我

们的囚犯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一类。

只要国际社会采用不只一种标准来处理世界问题,只要安全理事会决议仍得不到实施,只要有选择性地对缺乏任何保护的惹事生非者运用《宪章》第七章,人们就不会认为我们忠实于联合国的真正使命。

我们等了很久,希望国际社会表现出一些真正的关心。我们也不耐烦地等待安全理事会第425(1978)号决议得到实施,结果只是看到安理会没有谴责侵略,也没有实施其决议。在安理会确实表示谴责时,往往以支持和平进程为借口同时谴责侵略者和被侵略者。

我们被邀请参加马德里和平会议。当时我们对邀请,会议内容和发起国抱乐观态度。共同发起国是超级大国,会议将在“以土地换取和平”原则指导下的公正,全面和持久和平基础上以及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338(1973)和425(1978)号决议基础上召开。我们接受意见,参加了会议。在接受邀请的同时,我们也接受了会议的内容。人们指望我们讨论各种机制和安排。

马德里会议已过去三年。时间一个月一个月过去了,人们一再等待举行议会选举,总统选举,等待着在当地出现合适的时机和情况出现,以改善一方的处境,同时孤立另一方,或向其施压。

三年过去了,我们差不多已走遍了世界各国的首都。从马德里到华盛顿、到巴黎、到奥斯陆、又到莫斯科。我们现在仍在讨论本应在会议一开始就确定的基本原则。“以土地换取和平”原则中的土地概念仍有待下定义。撤离的原则仍然不明朗,因为所建议的撤离仍然意味着不同形式的占领。

就以土地换取和平进行谈判的原则以谈判地位平等为先决条件。但这条原则已不存在,因为阿拉伯谈判者受到压力,以至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我们被告知,抵抗必须停止,但不保证撤离或解放,抵制必须终止,但不保证恢复被篡夺的权利。我们不得不参加多边谈判,但又不知道是否有和平,和平的形式和内容是什么。我们被要求庆祝和握手,但又不知道庆祝的是什么。我们被要求考虑它国的舆论,我们必须让它国的舆论放心,好象我们自己没有任何舆论需要说服,好象我们国家就没有人还对我们选择和平提出疑问。

是的,我们这些侵略的受害者必须给予侵略者以安全保障。没有武器的人必须让拥有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的人放心。是的,我们参加了寻求和平的谈判,但是,我们要的是体面的和平、而不是内疚的和平;均衡的和平,而不是一面倒的和平;公正的和平,而不是不公正的和平;全面的和平,而不是部分的和平;真正的和平,而不是虚饰的和平;公平的和平,而不是有偏袒的和平;自然的和平,而不是人为的和平;永久的和平,而不是暂时的和平;人民的和平,而不是政权的和平;使我们自豪的和平,而不是使我们羞愧的和平;忠于我们烈士的和平,而不是背叛烈士的和平。

我们希望实现一个使难民得以返回,而不是永远四处流散的和平;一个使革命者满意,而不是触犯他们的和平;一个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力量的和平;一个我们可以保护的和平;一个将一劳永逸地使世界解脱我们区域这个负担的和平;一个将结束对外发泄愤怒的和平;一个繁荣、发展与稳定的和平;一个将使我们的寡妇不再悲伤的和平。

各国人民的问题只局限在他们自己国家内的日子已经结束。地理和政治界限构成各国人民之间障碍的日子已经结束。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相互依赖和相互交流的时代,一个所有障碍都降低的时代。没有那个国家太遥远。无论离冲突地区多远,仍然会受到冲突和不受国界或边界限制的人口问题的影响,除非在这些问题已开始出现时就加以制止。

我们一直会受到核污染、化学污染和细菌污染,因为大气层中是没有边界的。环境很可能会遭到污染,因为山峰无法阻挡风的吹动,大自然也不可能挡住河水的流动。

无论灾害在何时何地发生,我们都会受到影响。我们都关注世界的安全、它的稳定、繁荣、资源、需要、要求、市场和公民,无论它发生在哪里。

中东不能永远是一座一触即发的火山,威胁它周围世界的和平,给国际安全构成挑战,并给世界经济造成动荡。它不能一直是世界愤怒和怨恨的来源。

我们要让这个世界不再有被占领土和侵略行为,今后不再有更多的囚犯在监狱中受煎熬,不再有更多的血流过先知的土地。希望真主宗教的摇篮不再被黑暗笼罩。

这个区域将不会拥有比现在更有利的机会。时间不会永远站在寻求和平者的一边。我们区域必须象以往一样,产生具有远见的人,而不是和平的操纵者。

主席先生,我们在祝贺你担任大会本届会议主席时当然带着对联合国在你主持下所将作的工作寄予的希望。不能超出我们对联合国的总体看法去看待或理解秘书长所作的努力。在你为世界和平服务的过程中,愿真主给你引导,并照亮你前面的道路。黎巴嫩致力于世界和平,并为之而奋斗。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智利外交部长何塞·米格尔·因苏尔萨先生阁下发言。

因苏尔萨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应祝贺你当选主持我们的工作。

我希望你在担任主席时取得圆满成功,并向你保证,你可以依靠智利代表团的充分合作。

我还谨向秘书长致意,并再次向他保证我们将对他执行其艰巨的任务提供支持。秘书长在爱德华多·弗雷总统就职几天之后访问智利时有机会了解到我们愿意对联合国系统的活动提供合作。我们相信,要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要改善全世界所有人的生活条件,必须采取多边行动。

冷战造成的意识形态障碍的消失使人们对出现一个和平与全球安全的时代产生了期望。民主的扩展和全世界出现的对人权重要性的新的认识使这些期望得到加强。与此同时,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赖的进程正在为进步创造新的机会,并使技术和知识的传播更加可行。

然而,在冷战结束五年后,我们必须承认,现实离我们的梦想相距甚远。本世纪最后10年是充满不确定因素和矛盾的10年。在出现希望的迹象的同时,也令人遗憾地重新出现了许多种族、宗教和文化冲突以及分裂和分化的趋势,给和平带来了新的威胁,给国际秩序构成了新挑战。

这一过渡进程也加强了联合国作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保证者的作用。它促使联合国在为防止冲突而开展的谈判以及维持或恢复和平的行动中担负起新的职责。

然而,眼前对维持和平与安全的关注不应阻止我们认识并对付这些冲突的根源。贫困、个人及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环境恶化、失业和无知、人口过多、无组织的移民和对妇女及青年人歧视今天在引发冲突方面已成为与军事扩散或意识形态对抗同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的因素。处理这些问题需要运用国际社会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团结,也需要有与今天花费在解决已经开始的冲突方面同样数量甚至更

多的资源。人的安全必须与广泛促进人权一道成为国际优先事项。

今年3月,随着爱德华多·弗雷总统的政府宣布就职,智利的民主进程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进程的持续使我们得以加强民主体制的稳定,并在我国增强了对人权的尊重。当然,我们并没有说我们的民主是十全十美的,他在许多方面仍然需要得到进一步注意。考虑到这一点,智利国民议会目前正在讨论有关体制改革的立法草案。然而,我们相信,智利将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其他国家一道继续沿着政治稳定、使民主制度化和尊重人权的道路前进。

我们最近在经济方面的经验是成功的。自民主得到恢复以后,我们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6.5%,而且失业率很低,通货膨胀已得到控制。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我国政府制定了一项宏伟的现代化战略,其重点是以下三个主要方面:教育和培训、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国家的现代化。教育改革力图应付使青年人有效和创造性地参与社会活动的需要以及竞争性的挑战。国家的运作方面发生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对行使权力过程中的道德规范和公正性产生特别的关注。

实现这些优先任务应使我们能提高生产率,并在实行越来越开放的经济过程中提高我们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令我们担忧的是,大国仍然很难开放其经济中对开展公平的世界贸易至关重要的部门。我们拒绝接受以大国对准备接受竞争的国家实行保护主义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制。

但是,如果经济发展不能使大多数智利人生活条件得到持续的改善,这样的经济发展将失去意义。政府认识到这一点,并将消除极端贫困作为其纲要中的重要优先任务。没有公正,增长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大量人口遭受的匮乏所引起的紧张局势将威胁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是一事物的两个不同名称。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是我们的参照点和对外行动的自然框架,因为这一地区有着相同的政治和安全利益以及重大的经济利益。该地区已克服了前几十年所遭受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危机。该大陆的大多数国家最近举行了选举,或将在今后几个月中举行选举。安宁、开放和参与是今天这些进程的特点,这令人信服地证明,拉丁美洲已开始了现代化和稳定的重大进程。

随之而来的是合作与地区一体化的重大发展。涉及不同

地域范围和主题的一体化倡议和机制不断增加。智利参与了这些努力,与该地区大多数国家谈判签署了经济互补和自由贸易协定。在不久的将来,智利希望对创立广泛的拉丁美洲经济区作出新的贡献,与南锥体共同市场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并且在同墨西哥、委内瑞拉、阿根廷、玻利维亚和哥伦比亚签署互补协定后同厄瓜多尔和秘鲁签署此类协定。

我们也热心于加强与中美洲和加勒比国家的联系,我们已极大地发展了与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与合作。

我们希望在地区国家间促成一种和平、对话、与相互信任的气氛。我们相信,今天这种可能性比以往都要大,因为该地区的民主政府比起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

在这方面,里约集团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地区政治合作机制,最近其活动已扩展到经济协调方面。里约集团产生于我们大陆的重新民主化和复兴过程。该集团的加强对拉丁美洲在新的国际环境中以统一的声音说话的能力至关重要。这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主要伙伴的看法。我们与这些伙伴在我们越来越重视的论坛中定期会晤。

我们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的政策完全符合我们更密切参与世界市场的政策。今天的智利是一个向世界开放的国家,其国民生产总值的40%靠对外贸易。我们正努力加强与富有活力的增长和技术信息中心的关系。我们把我们的政策界定为开放的区域主义政策,谋求区域一体化并非为了关闭其市场,而是为了更大程度地融入世界经济。

在这方面,我们对多边主义的偏爱众所周知的。我们支持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广泛谈判的各阶段,目前正准备批准当时达成的协定。

我们在这方面的态度与我们拉丁美洲主要伙伴的态度相一致。在乌拉圭回合为期8年的时间里,该地区国家将其关税单方面平均降低50%多,以重大让步作出了贡献,尽管我们未能在谈判中实现所有目标。

因此,现在我们有权利呼吁实施乌拉圭回合的成果,并且一旦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在讨论乌拉圭回合遗留的许多问题,尤其是与农业和服务业有关的问题时取得进展。

然而,显而易见,在世界经济多边主义的现阶段,谈判达成的部分或地区性经济协定正越来越广泛地覆盖很大一部分国际贸易活动。因此,我们希望与北美实现一体化方面取得进展,我们正努力与欧洲联盟建立更为健康、更具有想象力

的经济关系模式。我们很快将加入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亚太经合会),并且与我们的地区一起随时准备与世界各地区发展经济合作。

目前的国际形势已导致在各个领域取得进展。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失败、裁军的进展、国际冲突的解决、合作与缓和——所有这些问题已使本世界组织得到加强。

智利祝贺以纳尔逊·曼德拉总统为化身的新南非人民和政府。我们欢迎联合国及南非人民自己在建设、尊重《联合国宪章》原则、民主、公正的南非方面取得的成功。

我们还要支持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正在进行的和平及谈判进程。我们敦促这两个国家的叛军按照联合国决议进行认真、有诚意的谈判,以结束冲突。在安哥拉问题上,安全理事会主席确定的在9月30日结束谈判的日期已临近,因此,必须在《和平协定》的基础上迅速达成解决办法。

我们还对通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协定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双方正在克服障碍,以在整个中东实现持久和平。我愿代表我国重申,我们支持以色列和约旦、以色列和黎巴嫩、以色列和叙利亚正在进行的谈判。

与这些积极步骤形成对比的是骇人听闻的卢旺达悲剧以及国际社会没有能力扼制悲剧,这使我们极为忧虑。智利发起了一场声援卢旺达儿童的全国运动,在我国受到了极好的响应。其中的危险是,如果不努力消除此类悲剧的深刻根源,就会在其他国家产生类似的其他紧张局势,对联合国系统的反应能力提出考验。

同样,我们不能不对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自相残杀的残酷争斗表示最深切的关注和最有力的反对。我们敦促交战各方放弃使用武力作为解决争端的手段,通过国际公认的和平方法解决争端。

智利对海地的局势也深表关注,这是由于那里的权力长期被窃取以及《戈弗纳斯岛协议》没有得到执行。对一国的军事占领始终是一件使人遗憾的事情,我们所有人都应避免。然而,在这一事例中,重要的是承认采取这一行动是根据安全理事会决议以及对再三不执行国际承诺作出的反应;海地军事当局本身要对此负责。

我们在大会重申对联合国采取的措施的支持,特别是全面接受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决议。智利政府将履行其参与重

建海地的承诺;一旦体制秩序得到恢复,重建工作将以与该国民政府已经达成的方式进行。

智利对维持和平活动进行了合作,并且最近还表示准备扩大这种合作,深信改善联合国系统的这种努力中具有的能力是一项优先任务。目前的这种为提供维持和平部队的国家带来严重负担的官僚机制必须被其他方法所取代,以便有可能为联合国配备最优良的人力资源和设施。就保护联合国人员的一项规约达成一致并且设立一个国际基金来管理维持和平行动的资金筹措是至关重要的。

国际裁军谈判,特别是关于核禁试条约的谈判所获得的新的推动加强了在此领域采取一种全球性、民主和参与途径的必要性。有迫切需要增加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名额,因为它是这些问题的唯一主要多边谈判的场所,以使其具有足够代表性并使其能够对各种新的挑战作出恰当反应。

智利认为,禁止将裂变材料用于敌对目的和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证的普遍化是沿着核裁军方向迈出的积极步伐。但是,其成功要取决于对检查与核查程序的全面接受。在实质性谈判取得进展的同时,还存在着延伸和扩大各种保障和管制机制的必要,直至它们具有普遍性,而又不会阻碍发展中国家使用科学与技术的可能性。

智利、阿根廷和巴西最近对《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批准以及古巴决定签署该条约将使拉丁美洲成为一个真正的无核武器区域。这同该地区紧张和军备得到明显削减一道构成了我们区域对世界和平作出的有效贡献。

在此方面,我们已经表明我们有兴趣成为开始于1996年阶段的安全理事会成员。我们这样作是因为我们确信,智利能够合法和充分地在这一个重要机构代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利益。

我们能够并且必须在设计更好的制度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以便防止冲突并为恢复和平采取迅速行动。但是,除非我们同时着手解决成为许多冲突的根源的严重的不平等和贫困的问题,我们将无法大幅度削减国际紧张局势。这些紧张的根源在于将世界人口的主要部分排除在新秩序所产生的益处以外,而这种排除又给人口增长和新世界经济的特征所加剧,因为当诸如知识和技术等要素在重要性方面逐渐超过拥有原材料或低成本劳动力的因素时,那些大量拥有后者的人所抱有的希望也就更多地变成了失望,从而扩大和加

深了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社会差距。

智利从其痛苦的过去所汲取的教训是,和平、民主、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一项安定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个人及其所生存的社区的安全。对不平等或排外的强调不仅在道义上无法令人接受,在政治上也是危险的。如果任何新的国际秩序是建立在将组成这种秩序的多数人排除在外的基础之上的话,这种秩序是不会稳定或持久的。

我们确信,民主的存在和缺少以人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是国际不稳定的根源所在,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夫雷总统曾经谈到“发展外交”,指的就是调整外交政策使其适应各国的目标 and 需求并且适应我们的国际行动和我们内部平等增长的目标之间所必须存在的联系。因此,我们对当前在联合国获得讨论的发展纲领寄予最大的重视。

这正是召集获得大会一致赞成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的理由所在。各个国家和政府首脑明年3月在哥本哈根所作出的分析会把我们引导到一个与贫困作斗争,促进就业和加速社会一体化的新政策。我们尤其认为,这次社会首脑会议应通过一项共同的承诺以便以一项具体和有效的行动纲领铲除当今世界的极端贫困。在那里所作出的决定将于正在出现在国际秩序当中的安全和共存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社会问题首脑会议以及最近在开罗召开的人口和发展会议、将于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会议以及秘书长所提出的发展纲领都表明本组织对社会问题所持的越来越大的兴趣。

智利准备遵守在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达成的各项协议并推动一项关于环境问题的新政策。在此方面,国民议会最近批准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并且我们的批准书已经交存联合国。我们还确信,如果不具备通过发达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行动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资源的话,各种环境问题将不会得到解决,并甚至有可能恶化。这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变得越来越明显,那里的贫困由于对某些资源的过度和无控制的使用正在加速环境恶化。

维护和平并且同时为消除产生冲突的结构性原因创造条件的双重任务是对本组织的一个巨大挑战。但是,我们深信,如果我们不迎接这一挑战,我们在进入下一个千年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为新的国际秩序奠定真正的基础,这一新秩序将使

人类能够和平共处。

虽然大国的参与对迎接这一挑战至关重要,但这不仅仅是它们的任务;相反,这一任务也是所有那些能够作出贡献的国家和事情,尤其是那些构成国际社会大多数的中型国家的事情。

智利准备参加这一努力,并且我们相信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也是一样。本组织的核心作用在未来的关键几年当中必须得到加强和支持,因为这是确保解决冲突不会改变国际法制的唯一方式,也是防止断然干涉和尊重弱者权益的唯一方式。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刚果外交、合作和法语国家事务部部长本杰明·本库卢先生阁下。

本库卢先生(刚果)(以法语发言):在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上,非洲大陆在这一伟大的机构里有一切理由感到荣幸。通过英明的选出其主席,我们大会赞扬了一位伟大的非洲外交官的功绩和品格。我还想说他的祖国由于为和平作出了贡献,完全应该得到这一赏识,此外,我们选举他也是为了表示对科特迪瓦的缔造者、当代非洲令人难以忘怀的丰碑乌弗埃-博瓦尼总统表示敬意。我谨向主席转达刚果代表团的最热烈祝贺,并借此机会赞扬他的前任圭亚那大使塞缪尔·因萨纳利,他非常能干和熟练的主持了第四十八届大会,理应得到赞扬。

我还要祝贺我们的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先生,他自从担任本组织领导以来以奉献精神努力促使会员国遵守《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我谨代表刚果人民向这位谦虚的人类公务员再次表示我们最真诚的鼓励,鼓励他履行其崇高的职责。

现在,在非洲的土地上可以找到联合国的许多维持和平代表团与亲善代表团。我们欢迎这一必要的协助,同时希望各有关国家人民将会作出更好的努力为恢复和平创造条件。

最后,南非共和国返回自由国家联盟受到了热烈欢迎,人民怎能不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南非的返回标志着非洲大陆反对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解放斗争的终结,必然使联合国会员国有理由感到满意,因为他们把很多精力和资源用于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我谨对体现整个非洲大陆希望的南非代表团表示热烈、友好的欢迎。

在四十九届大会开始之际,大会面临着一种复杂的情况,具有真正理由感到满意,又有特别令人烦恼的问题。一个明显的趋势是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促使我们希望建立一种更为人道和公平的国际关系新体制。冲突得到解决或者正处在解决过程中,这使陷于绝望或者是受到内战、民族关系紧张和宗教征讨侵扰的人们慢慢的对未来甚至生活产生了信心。

种族隔离在南非的废除,昨天似乎还不可能,今天却成了现实。似乎是为了满足国际社会的愿望和回报联合国的责难,和平过渡导致了一个团结、民主和非种族主义南非的诞生。

奥祖地带问题的和平解决使中非摆脱了一场自相残杀的冲突。我希望利比亚和乍得的例子也将激励其他国家。

在中东开始的和平推动力正在日夜强大并且给长期遭受战争破坏但因地理和历史原因生活在一起的各国人民开辟了合作的前景。因此,刚果共和国欢呼这一进程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希望我们将会看到阿-以谈判使得新的进展以便在中东建立彻底、公正与持久的和平。

但是,所取得的进展带来的希望由于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地区性的流血战争仍然受到挫折。政治分歧和民族、种族或者宗教的差异远未使社会丰富多采,反而引起了不容忍、仇恨、暴力,甚至毁坏了我们大家最为珍贵的东西--人类生命。从波斯尼亚到安哥拉,相似之处是惊人的。在掩盖若干基本问题的这些冲突中,我们看到非洲的数字创为记录:安哥拉、索马里、利比里亚、卢旺达.....。

刚果共和国仍然对兄弟的邻国安哥拉共和国的局势感到极大关注。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安盟的顽固和僵化,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还在继续。刚果政府支持国际社会作出一切和平努力特别是作为卢萨卡谈判的一部分来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安哥拉在谈判中提出了非常富有建设性的建议,表明多斯·桑托斯总统及其政府决心找到一项可能考虑到该国所有政治敏感问题的解决方案。我国重申希望看到安哥拉人最终实现谅解与和解,以便使他们能够致力于重建因为持续太久的战争而四分五裂的国家。

关于利比里亚,我们希望最近由几位领导人在加纳签署的停火协议会给该国带来较好的前景。

我们在卢旺达看到的种族灭绝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又一

悲惨篇章。它只是最极端和最不人道地表明了非洲今天面临的问题。暴力、贫困、饥荒、疾病、难民、人口剧增--这就是当今非洲给人的普遍印象。这种为人熟知、令人沮丧的情景毫无疑问来自经常存在的悲观主义而不是对现实的彻底研究。

令人遗憾的是,随着世界性市场、贸易、通讯甚至不幸的污染的出现,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之间不平等的加剧变得更加复杂。非洲长期以来被降为不足道的背景地位,似乎染上了所有的社会疾病,无情的摧残着日益增加和日益贫困的人口。在我们不发达的国家里,长期负债,基本产品价格下跌,同时,我们立法不管多么诱人和自由继续遭到忽视,导致公共发展援助与投资剧减,所有这一切使资金的枯竭和发展更加恶化。

这里发展出现缓慢,尽管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开始增长的初步迹象。非洲的失业人口在增加,工人们经常处在前景不明的状态。好象为使这种状况更为全面,自然灾害--干旱与沙漠化--同艾滋病和疟疾等流行病展开了竞争。我们认为已经消灭的传染病又再度出现。

主席恢复主持会议。

在这种灾难性经济的背景下,由于人口爆炸,纠正几乎是零的增长率和失控的人口增长率之间的不平衡的任何希望都已烟消云散。这个局势已摧毁了我们的所有复兴努力。

刚果也没有逃开这个共同命运。动摇了我国的最根本基础并给许多刚果家庭带来巨大不幸的社会-政治危机已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社会结构,并已完全毁灭了我国经济。这场危机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摧毁了许多幻想。

我们原来以为,或假装以为,只要简单地照搬旧式的西方民主,在国际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就足以保证使民主制度繁荣,而没有必要考虑到本地的现实。

欧洲议会确实从其失败中吸取了痛苦的教训,因为它告诉新的民主国家,各国人民和政府应该根据其本国的历史和文化特点来找到将使其能够创立民主的合法制度的办法。

我们如何能够宣称,我们在两年的时间里就消除了30年来我国社会食而不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所带来的弊病,况且这个文化在根本上敌视多元化的民主制度,并在根本上反对个人的发展?今天,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管理办法因为其

失败已经注定消亡,我们对其这么多年来有害影响又应该说些什么呢?

当今,刚果经济正在遭受不明智的经济政策所受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种经济政策给我国带来的名声是,它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之一。除了这种经济上的破产之外,我们还看到浪费、对我国文化和道德价值观的破坏、以及对我国人民的固有天才的摧毁。

赤贫和贫困现象不知不觉地,致命地渗入了男子和妇女的个人生活,这些人的数目每天都在增加,这些男子和妇女为了生存,不得不隐藏在最终的种族堡垒之后,而这已成了一个隔离和分裂的因素。

我国的青年被迫变得无所事事和易受损害,并受到长期失业的影响,他们现在正沉溺于毒品带来的幻觉,并用武力捍卫一些可疑的事业。

这样,我们看到了在一个人已丧失所有展望未来的能力的社会中,如此众多的有害因素所带来的后果的程度。暴力随之成为一种渠道,来发泄各种各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挫折感。

在刚果爆发的暴力是这一点的最荒唐的表现形式。我们必须依赖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来再度坚定致力于对话与和平,并从而意识到这种极端的行为是多么没有意义,并实际上只不过是人类的愚蠢。

我们已经赋予民主进程新的生命,并已从开始。这是一个把方向重定为分享权力的第一阶段,即民主过渡的进程;这是巴斯卡尔·利苏巴总统的发展方案的基础之一,即行政权力下放政策的成果。今天,反对党的领袖担任着我国的主要城市布拉柴维尔和黑角的市长,从而为国家的复兴作出他们的贡献。

刚果的经验着重表明了新的民主国家,尤其是年轻的非洲民主国家所面临的挑战,这些国家为了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国家,就必须摆脱多种族国家和一党制度或封建制度的状况,发展到充分的民主制度及其必然结构,即市场经济。

为了迎接这些挑战,刚果选择了一项经济和社会复兴方案,这个方案已经开始执行。该方案包括重新开始我国的发展。

我们的痛苦经验使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必须把经济放在首要地位,以便保护年轻和脆弱的刚果民主制度,使其有一个

坚实的基础,当考虑到我国各族人民的关键需要、我们本国的价值观和地缘政治现实的时候,尤其要如此。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上述方案在其初级阶段包括一个与布雷顿森林机构达成的结构调整方案,尽管这个方案将使我国人民作出巨大的牺牲,我们仍然决心成功地加以执行。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我们决心推动发展,并在我国人民之间恢复希望。我们指望重新开始进步,但刚果是无法独自取得成功的。拯救我们的是非洲。

事实上,我们应该在我们各国经济的一体化和取长补短方面去寻找办法,以使我们能够摆脱吞没了我们各国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特别要重新开始增长和发展。让我们希望,非洲各国将能够为这种相互补充创造条件,特别要通过采用科学技术来做到这点。

这一倡议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意见,这就是建立非洲经济共同体的极其重要性。但是,为了取得成功,这项努力不仅需要财政资源,而且需要人力资源。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国际社会坚决地帮助我们这些国家进行努力,来寻找能够在适当的机构内通过其专门知识促进发展的胜任的男子和妇女。

发展和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是我们非洲大陆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是为什么刚果政府按照这一发展要求成立了泛非管理和革新学院,以便进行资源管理,包括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人员培训。

对于这个项目的发起者巴斯卡尔·利苏巴总统阁来说,不能仅仅把发展定义为增长;还必须把它定义为掌握管理艺术的能力。

这项努力的第二个要求是资金。在这方面,我们并不仅仅依赖于财政资源,即向我们贫穷的经济注入的大量资金。各国经济仍需获得消化这种资金的能力。

比使资金流入我们各国更为重要的是,非洲首先需要建立一个金融工具,其机制将与现存的其他国际合作工具协调。这个金融工具将在所有非洲国家的支持下从国际社会,特别是从布雷顿森林机构获得适当的支持。

这样,我们认为,非洲开发银行是处理财政方面问题,并进而就一个为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集资金的制度进行研究的最好机构。科学和技术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是发展的基本因素;它们是实现发展的条件。



世界政治局势中有利的事态发展已产生了一种希望,即一个新的和平时代将使联合国发挥其创始会员国期望它发挥的作用。

所有情况——或者说几乎所有情况——似乎都成为新的世界秩序的好预兆: 滚滚而来的自由和民主; 重新出现的对人权的普遍意识; 以及联合国在解决有关国际和平、发展和安全等问题方面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不幸的是,作为冷战特点的核恐怖的精神变态已经让位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非洲发生的暴力和致命的表达自由的方式以及局部战争。我们已经指出,在经济方面的挫折感是这些事件的根源。因此,我们这些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就要求解决我们这些国家人民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以及改变世界经济制度,以期建立一个更为公正的秩序。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对发展纲领及其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期待和关心的能力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卢旺达异常的悲剧,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作出关于撤出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联卢援助团)这一关键性决定的时候,应该唤起各地人民的良知并使他们停下来进行思考。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的共同努力是极为明确的。这个全洲性的组织已经通过它的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机制对继续进行这些努力作出了承诺。

我国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撤离卢旺达之后又回到该国表示欢迎,撤离部队时我们痛心地感到该决定是不适当的。

尽管刚果有着它自己内部的困难,但它从一开始就对卢旺达的悲剧感到关切。为了表示我们的兄弟团结友情,我国已参加了在卢旺达进行的所有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行动,其范围从非统组织观察团、第一期联卢援助团和“绿松石”行动、到今天的第二期联卢援助团。

在从这些悲剧性的事件中得出结论的时候,在联合国中非安全问题常设咨询委员会中的十一个中非国家决定从各自

的武装部队中调派人员建立一支单一的维持和平部队。这一部队一旦建立以后,就将参加非统组织和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在如此痛苦地遭受到不稳定和内战折磨的非洲那一部分地区,该咨询委员会今天将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显示出是一种预防危机和冲突的宝贵的手段,并似乎值得受到国际社会的注意和支持。最近该次区域各国之间签订了一项不侵略条约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证。

我们相信,我国将于1995年3月和8月作为其东道国的、为争取次区域和平与安全而作出共同努力的这一框架机构将有助于防止危机和冲突,从而为中非的真正和平与合作打下基础。

在我们仍然看到有某些冲突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必须再一次承认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所发挥的杰出的作用。联合国会员国数目令人瞩目的增加以及全世界新的政治和经济势力的出现,要求在平等地域代表性的基础上扩大本组织。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唯一要遵守的是普遍性这一标准,而它一直指导着本组织而且必须不断地适应新出现的现实。

我们的命运必将变得日益密切地相互关联,我们的前景也必将日益广阔,而所有这些都本着一一种多样性、互补性和团结一致的精神,而没有要求权力或统治的愿望。科技的不断发展将导致我们必须面对的种种挑战成为全球性的问题。

让我们能够尽可能地利用对我们开放的巨大的潜力,使长期遭受痛苦的我们这些国家的人民将最终看到我们如此合理地渴望的和平与繁荣的时代来临。

下午8点10分散会。